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5年3月30日第48期

本期目录

史实考订

陈闯创 略谈文革初期没有“红卫兵运动”和“造反派”

书海泛舟

曲晓范 淘尽黄沙始见金——建构民间社会真实的历史记忆

姜东平 为信史留痕——《红叶满地》自序

姜东平 罹难者墓地（《红叶满地》选读）

柳溪公 具有历史价值的一本新书——推荐《文革中的山西》

李海文 《“四人帮”上海余党覆灭记》前言

附 《“四人帮”上海余党覆灭记》目录

生逢乱世

庞国义 文革中几次目睹武斗死难者

研余杂记

周孜仁 永远的遗憾

友情链接

《当代中国研究》特刊征稿

【史实考订】

略谈文革初期 没有“红卫兵运动”和“造反派”

陈闯创

按：本篇原是作者提交给美国纽约“2013 文革公共论坛暨有奖征文”的论文，已选入吴称谋主编的《历史期待拐点——重审文革与探索未来》一书（中国

独立作家出版社，2014年3月第一版）。作者提供给本刊时略有修订。

作者陈闯创是年轻的“80后”学者，1986年生于山东，2006年本科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2008年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得社会学硕士后赴美国留学。现旅居美国。

摘要：1966年8月1日前全国仅有北京极少数中学生自发团体号称“红卫兵”，这时还谈不上有红卫兵运动。1966年8月18日以后官方大力宣传“红卫兵”，各式红卫兵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但这种红卫兵运动既非自发性质也不单纯是学生运动。同样的，在官方于8月18日号召“造反”以后，“造反”行为才在全国范围内出现，在此之前各地群众写大字报等批判所在单位领导的行为并不是以造反的名义进行的。至于官方号召“揪斗牛鬼蛇神”及“破四旧”等行为则纯属镇压政治贱民，更无丝毫造反之意。“造反派”这个名词直到1966年8月下旬才出现，10月以后才流传全国，造反派的前身一般属于并被称为“少数派”。

文革中很多事情不仅现在看起来很奇怪，就是在当时也很令人吃惊。但研究者如果悉心搜集足够资料，总归还是能解释清楚文革的。但受中共数十年来曲解文革说法的影响（这种歪曲始自文革初期而非文革以后，只是这两个时期的歪曲方向不同而已：先是自吹自擂，后是极力贬低），绝大多数人都或多或少地被洗脑了。

最典型的莫过于把文革期间的各种坏事一股脑地推给林彪、“四人帮”之流。比如，2010年宋彬彬说她和母亲1968年4月被“四人帮”的亲信押送到沈阳¹，这简直是可笑之极。按照官方口径，可以推测这位亲信极有可能是指毛远新。可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组成小宗派是1974年由毛泽东指出并于1975年正式命名为“四人帮”²，这四人结帮最早也得到1972年王洪文到中共中央工作以后才实现的，毛远新怎么在1968年就成为了“四人帮”的亲信？更何况当时王洪文和姚文元都只不过是与毛远新平级的省市级革委会副主任而已。如果宋女士口中的这位亲信不是毛远新而是陈锡联或者其他什么人，那就更加匪夷所思了。

类似的，人们在谈论红卫兵、造反派时，也常会犯下这种时空提前的错误，尤其是谈及文革初期1966年8月以前“红卫兵”如何如何，或9月以前“造反派”如何如何“造反”时。原因很简单，在文革初期1966年8月前根本就没有“造反派”，也几乎没有“红卫兵”，同样绝少有人自称“造反”，直到1966年8

¹冯敬兰等：《也谈卞仲耘之死》，《记忆》总第47期，2010年4月28日。

²《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之《对“四人帮”的几次批评》，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月下旬以后“红卫兵”和“造反派”各种不同形式的“造反”才开始出现并慢慢成为文革的主流¹。

一、红卫兵和红卫兵运动

“红卫兵”是清华附中极少数学生在1966年5月底6月初成立的一个小团体的名称，相邻的北大附中同时期也出现了“红旗战斗小组”，这两个团体都是中学生自发成立的，而且当时彼此之间并无联系²。在1966年6、7月间北京少数中学也出现了类似的自发小团体，比如北京二十五中“东风”、矿业学院附中“红卫兵”等³，但笔者没有看到任何记录表明此间在北京以外也有名叫“红卫兵”的组织⁴。而且清华附中“红卫兵”仅仅是北京中学生若干自发团体之一，笔者认为这时候把“红旗”、“东风”这些自发团体统称为“红卫兵”组织是很不恰当的，进一步则可以说在1966年8月1日前这极少数⁵自发团体的活动还根本不足以构成“红卫兵运动”。

1966年8月前并未出现红卫兵运动和大量群众组织的最重要原因就是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官僚机构在遵循惯例，对各种自发民间组织采取高度警惕和严厉压制的态度。实际上中共建政数十年来，只有1966年8月到1968年7月间毛泽东下决心允许民众在拥护、保卫毛泽东的旗帜下自行成立各种组织、发行报纸⁶，这也是毛泽东主导的文革与共产党发动的其他所有政治运动最大的区别所在⁷。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旗”成立初期的成员主要是中共干部子弟，且政治态度激进，所以被进校的工作组视为左派、可以依靠利用的力量。但即便如此，因为他们的独立性，也很快就受到了官方强大的压力。共青团中央负责人胡克实在1966年6月27日对派到清华附中的工作组组长刘晋说：“我

¹ 十几年前何蜀先生就注意到混淆文革各阶段的回忆、论述经常出现，他并提出应该对文革不同阶段分期并明确其不同历史特点。见何蜀《对“文化大革命”历史分期的思考》，华夏文摘增刊第316期，2002年12月2日；另见何蜀《“文化大革命”中的歌曲》，华夏文摘增刊第235期，2000年10月18日。

² 卜伟华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1966—1968）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45、149页。

³ 卜伟华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1966—1968）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70页。

⁴ 比如在广州至迟在8月11日还没有红卫兵公开亮相，但到8月底，红卫兵这一名称已经充斥于各种文件材料了。见一听《广州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华夏文摘增刊第271期，2001年10月22日。

⁵ 自1966年到现在近50年了，还没有任何可靠的材料表明在1966年6、7月间全中国到底有几个名叫“红卫兵”的团体，笔者估计最多也就在北京十几到几十所中学里存在而已。

⁶ 1966年8月毛泽东致信清华附中红卫兵表示支持造反，1968年7月毛泽东召见并严厉指责北京五大高校造反派领袖，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时各地群众组织已基本解散。

⁷ 杜钧福：如何从普世价值分析文革，2013年10月16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7878230101c2zk.html 另外，切不可以为在文革头两年里中国就真正实现了当时《宪法》第87条上写的结社、言论、游行自由，1967年初中共明令取缔各种自发成立的全国性组织，就明白地说明了中共仍然极为忌惮自发组织。见1967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通告》，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第292页。

看就是要消化红卫兵，能不能把党团组织恢复起来。对红卫兵的政策，采取教育提高方针，作为依靠力量之一，把红卫兵消化在党团组织之中”¹；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13日开会讨论北京中学文化革命时说“搞秘密团体都不要，地下活动是错误的”²；中共派往北京大学的工作组组长张承先7月11日批评北大附中“红旗”是“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刘少奇7月14日称“红卫兵是秘密组织，也是非法的”，这都给这些中学生自发组织带来了很大压力，有的人数剧减，有的被迫解散³。

但在毛泽东于1966年8月1日《致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信》流传开后（实际上这封信从未发出，具体流传经过颇值得研究），仿效“红卫兵”和“红旗战斗小组”的组织开始在北京大量出现，甚至在外地极少数若干消息灵通的学校里也出现了。比如，上海最早以红卫兵命名的组织，是由复旦大学外语系学生劳元一于8月11日发起成立的“红卫兵战斗小组”⁴。哈尔滨最早的红卫兵组织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于8月15日成立⁵。在广州，第一个红卫兵组织于8月11日出现于当地最有名的中学华南师院附中，其成员以高干子弟为主⁶。在南京，江苏省最有名的中学南京师范学院附属于8月9日首先出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成员以省市干部子弟为主⁷。在天津，天津一中是高干子弟集中的学校，直到8月15日才有红卫兵组织成立⁸。

毛泽东在信里同时表扬了“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和“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表示自己热烈的支持他们“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正因为毛泽东的赞扬和撑腰，“红卫兵”和“红旗战斗小组”这两个名称获得巨大光荣，北京的中学生纷纷赶潮流成立自发组织，但当时名称仍未统一，除主要是以红卫兵或红旗命名外，还有红卫军、赤卫队、红红红、狂飚、红色尖兵⁹等各式各样的名称。比如清华附中、北航附中、人大附中三个中学的红卫兵在1966年8月6

¹ 《胡克实在刘晋汇报时的讲话记录》，1966年6月26日、27日。转引自卜伟华《阎阳生〈清华附中红卫兵100天〉若干史实辨正》，《记忆》第10期，2008年12月28日。

² 《刘少奇邓小平六七月间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指示》，出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2006年（第二版）。

³ 卜伟华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1966—1968）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70、171页。

⁴ 李逊：《“红八月”：十七年阶级斗争的延续》，《记忆》总第94期，2013年2月28日。另据华新民《华尔街红卫兵》，劳元一的父亲劳辛是中共情报系统的高官，以至于尽管在1967年初劳元一等人发动“炮打张春桥”，但劳本人并未受到严厉惩罚。

⁵ 见哈军工大事记之1966年 <http://cjb.hrbeu.edu.cn/contents/176/314.html>。众所周知，哈军工是中共高干子弟云集的学校，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1965年从该校毕业，并于1966年9月返校参加文革并加入“红色造反团”。

⁶ 见杨小村《我在文革初期的红卫兵经历》，摘自杨小村回忆录《我与一个时代的握手》，香港伟确华粹书局有限公司2010年12月出版。

⁷ 见小草《南师附中文化大革命风云录》。

⁸ 见王端阳《红卫兵日记》。

⁹ 中央音乐学院“红色尖兵战斗队”代表：《我们见到了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人民日报》1966年8月19日第7版。

日联合发表《紧急呼吁书》说到“一小撮混蛋披着‘红卫兵’、‘红旗’等革命左派组织的外衣……”¹，显然这时“红卫兵”还不是革命左派组织的唯一代表或者代名词。至于北京以外，因为各种原因（一般是工作组问题）也已经有自发的学生团体出现，但一般是叫作某某“战斗队”或“战斗组”，由于信息传播不发达，他们几乎没有人得知毛泽东赞扬“红卫兵”和“红旗”的消息，当然就不会想到以“红卫兵”来命名。直到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群众大会上特意给予红卫兵种种殊荣（比如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代表，戴上红卫兵袖章等等）后，在官方大力宣传和组织之下，红卫兵运动才真正在北京以外出现，并且很快由学校扩展到工厂、农村，但很明显这时的红卫兵运动绝非单纯的自发运动，更已超出学生运动的范畴。

学生群众组织的名称并非一开始就统一到“红卫兵”的旗帜下，而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在8月18日前“红旗战斗小组”的知名度可能还要高于“红卫兵”，比如8月11日《人民日报》就转载了北大附中红旗的彭小蒙8月10日发表在《中国青年报》的文章《有了毛泽东思想就无往而不胜》²。即便到了8月18日晚上，周恩来在接见北京三十一中“七一”赤卫队队员时，赤卫队提问：“如果统一组织，中央能否作出具体的办法？”周恩来说：“红卫兵、红旗、赤卫队等等是一定能统一起来的。这些组织与红军是有区别的，叫红军不妥当，红卫兵是外国的名字，赤卫队是本国的名字，我看赤卫队这个名字好。”³但不知为何，在随后官方媒体的报道中红卫兵的位置极其突出，所以最终还是统一到红卫兵名称下。

现在人们一般称1966年8月18日的群众大会为“毛主席首次接见百万红卫兵大会”，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并不确切。不同于稍后几次毛泽东特意接见红卫兵的大会，8月18日大会并非专为接见红卫兵而举行，而且出席红卫兵人数也仅有几万人而已。8月19日《人民日报》的报道很清楚地说明这次大会是“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⁴，“几万个系着红袖章的红卫兵们……在今天的大会上很引人注目”，出席的百万群众中还包括“首都工人、农民、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机关干部”⁵。

清华附中红卫兵创建人之中的骆小海说：“1966年7、8月之交，工作组撤离，学生建立独立组织，是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运动的一个分水岭。外间所熟知

¹ 卜伟华：《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始末》，《中共党史资料》第70辑，1999年，第125页。

² 见《北京大学附中“红旗”战斗小组 彭小蒙：有了毛泽东思想就无往而不胜》，《人民日报》1966年8月11日。

³ 《周恩来接见北京三十一中“七一”赤卫队队员时的谈话》，出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内部资料，仅供参考）》（北京汽车分公司文革大字报办公室、北京汽车分公司行政保卫文革、北京国棉三厂文革筹委会宣传组，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引自宋永毅等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6年版。

⁴ 见《在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上林彪同志的讲话》，《人民日报》，1966年8月19日。

⁵ 见《毛主席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大革命》，《人民日报》，1966年8月19日。

的‘红卫兵运动’这时才形成它的主流性格特征。清华附中红卫兵并非这个主流的引领者，其贡献仅限于‘红卫兵’这一名称和造反精神而已。”¹笔者认为这个说法是比较恰当的。

二、造反和造反派

“造反”这个词一般是贬义的，尤其是在中共高度垄断权力的背景下。在1966年8月以前的文革运动中，极少有人敢自称造反，相反那些大胆质疑工作组或中共党委的行为却常被当权者指责为“造反”²。现在人们常把1966年8月之前的各种挑战当权者行为统称为“造反”，笔者认为这有所不妥，因为既不符合当时的事实，也忽视了“造反”一词由负面转为正面的过程。完全是因为在8月18日毛泽东率众庆祝文革大会后中共及其舆论机关竭力赞扬、鼓动造反，“造反”才开始成为文革的关键词。但这之后的造反大多名不副实，正如徐友渔所说，携最高领袖之势造官僚之反其实是货真价实的保皇而已³。

《人民日报》在1966年1月到7月间30多次提到“造反”，几乎全是负面字眼，比如6月12日发表文章《砸碎煽动反革命分子造反的破喇叭》，其中批判电影《逆风千里》“企图以此告诉国内的一切牛鬼蛇神：造反是可以的，共产党是软弱可欺的。”但仅有的一次正面提法却极其关键，6月9日在《汉弗莱的哀叹》一文中公布了毛泽东的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⁴

骆小海是“造反精神万岁”的首倡者，但其实号召造反的源头还是毛泽东本人。1965年夏天毛泽东鼓励王海容“造反”去违反学校纪律，这个谈话不久后主要在北京干部子弟间流传，有些人就接受了这种“造反精神”，清华附中的骆小海正是其中之一，并于1965年10月28日在班上贴出《造反精神万岁》的小字报⁵。

除此以外，毛泽东、刘少奇早都讲过“如果中共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比如在1964年毛泽东关于接班人问题的著名讲话中，刘少奇插话说：“如

¹ 骆小海：《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序，2006年4月19日。

² 1966年6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北京四中全体革命师生响应女一中同学的革命倡议 向毛主席表示赞成废除旧的升学制度》，信中说：（资产阶级老爷）骂我们这是“造反”，这是要“翻天”。

³ 徐友渔著：《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0页。名曰造反实为保皇的最典型例子当属1967年7月18日戚本禹召集所谓“中南海机关造反派”批斗刘少奇。当时在中南海的机关就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和警卫局，这里的工作人员是最需要遵守中共的严格纪律的。他们按照顶头上司戚本禹（因中办主任汪东兴陪毛泽东南下武汉，留在北京的中办秘书局副局长戚本禹主持中办工作）的指示批斗被毛泽东赶下台的刘少奇，哪里有一点“造反”的意味呢？

⁴ 见《人民日报》1966年6月9日《汉弗莱的哀叹》、6月12日《砸碎煽动反革命分子造反的破喇叭》。

⁵ 卜伟华：《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始末》，《中共党史资料》第70辑，1999年，第98到99页。

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一个省可以独立，可以造反。”¹ 1965年10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专门讲了造反问题，说到：“中央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不造反就犯错误，要准备造反。”² 在1966年3月20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讲到“学生要造反，要允许造反。文化革命要搞群众运动，让学生鸣放。”³ 3月30日毛泽东同康生、张春桥讲：“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⁴ 当然，现在没有证据表明这些讲话在文革前就流传出去了，但至少表明了毛的一贯想法。

清华附中红卫兵因为反对《中国青年报》1966年6月23日的文章《左派学生的光荣责任》，于6月24日写出大字报《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提出“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并于7月4日贴出《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引用了一个月前《人民日报》公布的毛泽东语录“造反有理”。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7月8日的文章《烈火包不住，揭开这个盖子》说：“广大革命学生积极投身到这场造反运动中”，“革命是暴动！造反是暴动”⁵。中共北京市委负责文革运动的郭影秋7月3日汇报说“有的人甚至贴出了‘革命是造反，暴动万岁’的大字报”⁶。

尽管6月9日《人民日报》就公布了毛泽东关于“造反有理”的讲话，但直到毛泽东于8月1日写信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说“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后，“造反”才真正取得了最高许可。至于《人民日报》第一次以正面口气报道文革中的造反行为，则是在公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以后，在8月10日以《我们不怕！不怕！不怕！》为题刊登了北京市女十二中给毛泽东的信，信中提到“对资产阶级造反，造得对，造得有理”；但首次直接正面报道“造反”这个词（这也是当月《人民日报》第二篇提到“造反”的文章）则是在8月18日接见大会后，于8月19日在《毛主席同红卫兵在天安门上》的报道中引用骆小海的话说：对于《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这篇文章“毛主席首先站出来支持我们，高度评价了这篇文章的革命精神。”⁷自此《人民日报》开始连篇累牍鼓励造反，仅8月19日至8月30日就有62篇报道和文章等颂扬造反，而且在8月24日至8月27日连续4天重复刊登毛泽东

¹毛泽东在十三陵关于地方党委抓军事和培养接班人的讲话，1964年6月16日。

²见《毛泽东传1949-1976》第34章：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³毛泽东1966年3月20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见宋永毅等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6年版。

⁴见《毛泽东传1949-1976》第34章：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⁵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烈火包不住，揭开这个盖子》，见宋永毅等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6年版。

⁶郭影秋：《关于北京市文教系统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汇报要点》，见宋永毅等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6年版。

⁷见《人民日报》1966年8月10日《我们不怕！不怕！不怕！》、8月19日《毛主席同红卫兵在天安门上》。

关于“造反有理”的语录全文。

顺便一提，正是北大聂元梓等人批判北大校长及中共北京市委的大字报于1966年6月1日被中共各大媒体公布后，全国范围内才在6、7月间大量出现了“自发”批判所在单位（以学校、文教宣传机关为主）中共党委或者工作组的行为。既然官方公布这张大字报表明了最高当局允许学生怀疑和批判中共地方党委及学校对待文革的态度和做法，可以说这种批判行为既无造反之名，也无造反之实。尽管8月以后“造反有理”成为官方鼓吹的主旋律，8、9月间的“造反”仍基本是在中共领导下的政治强势群体（比如“红五类”子弟，尤其是干部子弟）打击各类政治贱民的过程，同10月后民众响应毛泽东号召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造反”在形式上有很大差别¹。

至于“造反派”这一名词最早如何出现尚有待考证²，但应该要在1966年8月18日中共许可并鼓动“造反”以后。在笔者现在所能查到的资料中，“造反派”名词最早出现于上海：时任上海市长曹荻秋1966年8月26日在复旦大学说：“造反派中掺杂着两类矛盾，既有人民内部矛盾，又有敌我矛盾”、“造反派晚间活动不够正常”，而且这份记录还明确说明至迟在1966年8月23日“革命造反派当时称做少数派”³。至于《人民日报》首次提到“造反派”，则是在1967年1月9日转载上海《文汇报》1月5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文中8次出现“造反派”字眼，次次前面都加着“革命”二字。实际上当时的普遍提法是“革命造反派”，很少单说“造反派”；群众组织在以“造反”命名时，一般也都在“造反”前面加上“革命”或“红色”二字。以联名发表《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11个组织为例，其中3个是用“造反”命名的，分别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新闻界革命造反委员会”和“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⁴。

在1966年8月前各地确实也有派性分化的迹象，但当时的表述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与“资产阶级保皇派”、“多数派”与“少数派”或者“真左派”与“假左派”的对立。用“造反派”与“保守派”之争来描述群众的分化对立则要晚些。

“革命派”与“保皇派”的称呼来自1966年6月5日《人民日报》评北大文革的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其中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展开……向一切人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是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当资产阶级保皇派？每个人都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社论结尾自

¹ 参见何蜀《对“文化大革命”历史分期的思考》，华夏文摘增刊第316期，2002年12月2日。

² 比如造反派的名称最早是怎么出现的，是自称还是别人封的？“造反派”的名称是伴随“保守派”一同出现的吗？

³ 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革命造反派1967年11月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见宋永毅等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6年版。

⁴ 见《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人民日报》1967年1月9日。

信地说“绝大多数人，95%以上的人，必然会唾弃资产阶级保皇派，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一边”，可在社论发表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局势并非如此，“保皇派”一般占多数，“革命派”则是少数。比如，在广州地区文革标志性的“8·11 中医学院事件”中，广东工学院的学生指责广州医学院的多数学生为保皇派¹。

实际上，“多数派”、“少数派”是当时很流行的提法。徐海亮在回忆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初期的情况时说：水院里“多数派”、“少数派”的提法盛行于七八月间，到八九月，毛泽东支持“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信，已经人人皆知，少数派渐渐成了自认和公认的造反派²。何蜀也说在全国许多大专院校的造反派师生刚开始都处于“少数派”地位并且也被称作“少数派”³。在1966年7月29日宣布撤销工作组的“北京市革命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刘少奇不仅承认“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也不晓得”，还特意强调要“保护少数”⁴。

据笔者所见资料，组织名称中最早加上“造反”的当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实际上在哈军工是先有多数派和少数派的分化，再有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成立：8月6日“军工红色造反团”成立，8月10日“军工八八红旗战斗团”成立。8月15日“造反团”成立了红卫兵，8·18当晚“八八团”召开红卫兵成立誓师大会⁵。

1966年9月6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后来名声赫赫的“首都三司”）成立，相比之下，8月27日成立的一司“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和9月5日成立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都没有在名称里鲜明地打出“造反”旗帜。实际上，1966年8月份自发成立的诸多学生团体的名称中一般很少出现“造反”或“红卫兵”字样（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北京建工学院少数派于8月1日成立“八一战斗团”，多数派次日成立“革命团”；清华大学反工作组的部分学生于8月8日成立“八八串联会”，次日另一派学生成立“八九串联会”；北京地质学院8月8日成立“东方红战斗队”，8月12日广东工学院成立“一二红旗公社”，北京航空学院8月20日成立“红旗战斗队”，北京师范大学8月23日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南京大学8月23日成立“红色造反队”、8月27日成立“八二七革命串联会”、8月30日成立“红旗战斗队”⁶，开封师范学院8月24日成立“八二四造反队”，重庆大学

¹一听：《广州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华夏文摘增刊第271期，2001年10月22日。

² 徐海亮：《波澜乍起》，华夏文摘增刊第348期，2003年7月21日。

³ 何蜀著：《为毛主席而战——文革重庆大武斗实录》，香港：三联书店，2010年8月，第15页。

⁴ 莽东鸿：《1966年刘少奇最后一次在万人大会上讲话》，《党史博览》2013年03期。

⁵ 见哈军工大事记之1966年 <http://cjb.hrbeu.edu.cn/contents/176/314.html>。另据1966年11月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红色造反纵队的大字报《我们与“八八红旗战斗团”领导人分歧的由来和发展》，“红色造反团”于8月17日正式宣布成立。

⁶ 见董国强《耿昌贤访谈录》，《记忆》总第16期，2009年3月1日。据耿昌贤回忆，他们之所以敢用“红色造反队”命名，是因为1966年8月18日接见大会上他和文凤来等人在天安门城楼上被毛泽东接见，稍

“八一五战斗团”成立于8月26日，等等。

成立于1966年11月9日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工总司”）据说是全国第一个工人造反派组织¹。在11月6日贴出的成立工总司的海报上明确出现了“革命造反派”的讲法²，但即便这时工总司的人也不是没有在共产党统治下自命“造反”是否合适的疑虑³。

¹此说见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第2版）第107页。但上海工总司是否是第一个名称里带“造反”的工人组织，笔者尚有疑问，待考。

²周良霄、顾菊英编著：《十年文革前期（65.11—69.4）系年录》，1966年11月6日。

³见黄金海：《“四人帮”兴亡》一书的得失——与叶永烈商榷（一），《记忆》总102期，2013年9月30日。

【书海泛舟】

淘尽黄沙始见金

——建构民间社会真实的历史记忆

曲晓范

按：本篇系为姜东平著《红叶满地》一书（吉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2015年1月第一版）所作之序。曲晓范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人类的行为，无论是伟大的，还是卑微的，无论是功勋，还是罪过，一旦发生了，它就是历史，就会提升为人类的精神文化遗产。文明进化到今天，我们都有无可推卸的真实记录的责任。“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可以“资治”，尤其是民间史料，它必然是未来信史的补充和佐证。对于历史，我们不能失忆，也不能像熊瞎子掰苞米那样，随便遗弃。如果后代对于我们，还要像我们对于三皇五帝、夏、商、周那样“考古”，岂不是文明的幽默吗？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历史时段内，我们的确曾经创造过一个又一个的辉煌，出现了一个个莺歌燕舞的美好日子，但也因执政者的决策失误和严重错误，让百姓蒙冤受难，这其中既有时至今日依然得到政治上部分肯定的“反右派”运动，又有“大跃进”“人民公社”年代对生产力的破坏和之后那个罕见的灾荒岁月，当然更包括“以阶级斗争为纲”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革……这期间，无数人受苦受难，甚至为之失去了生命。尽管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曾作出了历史决议，对其中的某些历史事件重新定性。但是对受难者及其家属的平反是不彻底的。例如，我们的平反只限于反右运动之后，此前的土改、镇反、肃反中那么多被误判、误杀的人并没有给予重新甄别和改判的结论；即使是反右运动，

后《解放军报》记者建议他们成立类似“红卫兵”的组织。

受难者得到的仅是“因扩大化错定”的半政治平反，其工资待遇亦仅是恢复被打右派之前的行政级别和补发因降级减发或停发的工资，许多蒙冤者被捕所遭受的“冤狱”苦难，还从来没有从国家角度给予一定赔偿。至于因其受害随之连带的家属精神株连和政治打击就更没有得到过必要的抚慰和补偿。另一方面，责任者不承担任何责任，对于此间利用政治运动诬陷和迫害他人的恶人，任他们逍遥法外，也没有得到必要的惩处。这无疑是对法律和法制建设的任意践踏。

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品质，阳光和坦白是政治自信的应有表现。我们作为一个重视历史研究、勇于承担历史责任的民族和文明史悠久的国家，不应该将这段历史淡化和忽略。如果我们试图将这个历史欠账永久覆盖住，希冀随着受难者日渐凋零，与之伴随的那一幕幕悲惨的历史真实图景会渐次消逝，这不仅是徒劳的，更会带来深层的社会危害，累积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应该相信，后人一定比我们有更多的智慧和更少的局限。所以，为了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民族永续繁荣昌盛，我们应该勇敢面对和认真研究这段历史。

但是到哪里能找到研究这段历史的完整材料呢？

毋庸置疑，中国是一个档案保存大国，近现代官方档案汗牛充栋。但是，如果到官方档案馆等部门查阅涉及这段历史的“敏感材料”时，这些部门通常会无视“档案形成三十年后对外开放”的国际惯例和国家的相关规定，立刻以“正在整理”等托词予以拒绝。那么，什么时候能够“整理完成”并对外开放呢？时间没有尽头，那你就无限期地等待吧！况且，有些敏感档案有的销毁，有的已经遗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依旧执著于此领域的研究，一是到国外的档案馆去尝试搜寻，另一个是深入民间开展文献的征集和调查。这两个角度，都不容易，前者需要通晓外语并有海外关系等相关条件作保证，后者不仅需要耐心，更要有一个对个人荣辱和现实利益保持超脱和淡泊的心境，因为从事这种非但没有鼓励和支持还时有打压的学术研究，收获的往往是政治风险。

姜东平，作为文史学者，秉承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20多年来，踽踽而行于民间史料搜集和政治运动历史研究的艰辛历程。

多少个寒冬黎明，东平兄冒着凛冽西风奔走在一个个书摊间，瑟瑟缩缩地在参差、杂乱的旧书堆里寻找自己期待的资料；即便在炎夏，他为争取多一点寻书时间，时常放弃休息，揣上充作午饭的烧饼，匆匆奔向书贩云集的旧物大厅。东平兄独具慧眼，一张照片，几张字纸，哪怕是残破的黄卷，在他眼里有的是奇珍异宝。经过上挂下联，深度发掘，就是他一份喜出望外的史料收获。

东平兄的整理、修补功夫特别到家，无处不体现着精细和规范的品质。回到家里，即把每次搜集到的珍贵资料修补整理，按时序，分内容，成系列装订成卷。日积月累，东平兄竟然拥有了多达千卷稀见的地方档案资料，和他精到的人物寻

访。这是我见到的最为集中的民间历史档案个人收藏。不仅为他自己、更是为我们这个相对缺少民间历史收藏的城市增添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宝库。

随着文献入藏量的不断增长，还在十年前，东平兄即结合本职工作展开了他独特的当代政治运动史研究。他的研究视野宽阔，但中心点始终固定在典型事件复原、当事人物心路历程挖掘、公众记忆重新构建三个观点上。历史哲学家柏格森说：现实是与过去相区别、相联系中才显现出来的，我们感知的现实每时每刻都铭刻着公众记忆，关心记忆是他们关注现实的一种方式，记忆的原则是“真实”，在记忆不自由的环境下，记忆的真实便成为一种记忆者的道德行为。

最近十年来，长春也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兴起了口述史学的记忆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补充了以往所屏蔽的史料和文字记述上的不足。但是这里面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表达的主题的相对偏狭和叙述内容的选择性缺位。由于以往相对固化的政治宣传的惯性作用影响，在做长春史或吉林史回顾的时候，多以日本侵略和反侵略战争过程为主线，而尽力避免接触“敏感”的1950~1970年代发生的历次政治运动。即使涉及了，也是蜻蜓点水，一笔带过。一方面是因为口述者经历的事情时间过去太久远，遗忘让口述者难以复原历史场景；同时，口述者在长期的左的环境影响下，思维模式早已将头脑中的历史记忆层层覆盖了，所以口述出来的记忆史料就自然变形了。另一方面，组织口述活动的有关部门为保证审查通过，也要先行设置界限和规定表达形式，因此在最终的成果载体上，或是闪烁其词，或是赞美性的掩饰，几乎没有可作为参考的文献价值。东平兄的研究就是在力图恢复和构建历史场景的原貌时有所突破。如在他的《土改逸闻》中，作者为准确地揭示榆树等长春周边各县在土改运动中大量出现的私抓乱捕、践踏人权的斑斑实情，选取了曾直接参与或亲历土改过程的原吉林省卫生厅中医处长奚国富、长春拖拉机配件厂干部刘中人，以及榆树县贸易局副局长丁希光等人在文革中提交的交代材料，从中细致地整理出几个有代表性的恶性事件过程。如为“宣传群众需要”，将“根本没有血债只有好名声”的土桥区地主村长李禹樊无辜“定罪”斗争致死；为了表现“大义灭亲”，将父亲检举揭发出来，财产抄没，并由群众随意剥夺生命（人被绑在马尾上，赶马将其拖死）的悲惨情景；再如“共产党员土改干部梁国林因在土改中犯了与本地妇女关系暧昧的生活错误”，即被另一与之有矛盾的村土改负责人检举，召开批判会接受斗争，将个人私忿上升为“阶级公仇”的事件，这个过程遂被蓄意报复梁国林的土改干部郭树堂充分利用了，他以棍棒作为刑具对梁施以暴行，将其多根肋骨打断，梁在无法活下去的情况下被迫自杀的基本史实。在这些恶行、暴行中，我们无法看到这场运动在改变中国农村历史进程中的正面意义，却能引起我们对中国社会中直至今天仍然有人为民粹主义思潮的扩散推波助澜的深层历史动因及其巨大危害的思索。

从 1950 年起，为巩固政权之需要，国内由对敌对分子的公开镇压，转向对“暗藏的敌人”的内部清除，先后以镇压和肃清反革命、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名义，接连发动了镇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三反、五反、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肃反、反右等一个又一个运动，表面上看，斗争目标是清除各级政府和社会团体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其实质是要分梯次冲击社会各个方面，在抓出政治异己分子的同时，让社会肌体中的每一人都受到不同层次的无产阶级专政教育。在这铺天盖地的政治风暴打击下，知识分子阶层遭受的损伤烈度最大，几乎每一个知识分子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改造。即使是其中少数人因其社会影响较大，暂时逃过了被公开批判和处理，但是一次次虔诚地表白检讨，反复述说“知识分子改造工作的伟大”，也足以使其人格尊严和学术威望被剥离得荡然无存。为了追寻此间知识分子改造历程和知识分子当时内心的真实感受，东平兄深入挖掘了在当时吉林省及国内史学界著名的丁则良、丁则民兄弟在 1950 年代的遭遇经历，透过其对丁氏兄弟细腻的史实描述，让我们看到了两位矢志爱国的海归知识分子在夹缝中生存的艰辛和痛苦。

丁氏兄弟来东北时，“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高潮已经过去，渐近尾声。他们一到单位，就立刻受到落实运动“成果”的直接影响了。由于兄弟二人均为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的海归学者，所以从属于党的既要改造又要使用的对象，于是首先就被有“政治资本”的年轻教师给予了“革命同路人”的政治待遇，学术地位迅速下移。接着，他们看到教师的“尊严”受到挑战。课堂上，学生随意质疑史实和结论，当教师不好给予回答或出现概念错误时，学生的嘲弄和揶揄就接踵而至了。随后，产生精神恐惧。他们本来是积极参加各种运动的，但当看到有的教师“因言获罪”被惩处、有的人甚至自杀等现象时，开始对政治活动产生忌惮和畏怯。最后，是获罪和罹难。兄弟俩一来长春，就对各自单位缺少“民主集中制”气氛感到吃惊，试图在维护领导尊严的前提下，提出一些领导能够容忍的“建设性意见”。后来，就觉得为了工作需要似乎应更大胆一些。1955 年，丁则良随学校领导到高教部汇报工作。会上，东北人民大学领导报喜不报忧，丁则良认为这是不对的，他当场在教育部领导面前揭了学校领导的短，反映了学校的真相，让领导感到难堪。同年，在教育部派检查团来东北人大检查工作时，丁则良又和余瑞璜等著名科学家一同以民盟人大支部的名义上书教育部。他的做法得到教育部领导的肯定，却因此埋下了最终被整治的祸根。

1957 年反右运动开始后，随着毛泽东的总体部署转向，民盟领导人章伯钧、罗隆基“作为右派代表揪出”，全国开展反右斗争。这时，东北人民大学套用中央的总体模式，将丁则良与余瑞璜等一同定为“吉林民盟反党小集团”主要成员，这个罪名一经被扣上，就标志着其政治生命的就此终结。此时丁则良因出国讲学，

与国内没有通讯联系，一切都蒙在鼓里。8月，丁则良回国一到北京得知对他的“揭发批判”，痛苦至极，顿时精神崩溃。虽然家里人也担心其出事，进行了防范，但他还是投入北京大学未名湖自杀身亡，一个正待走向更加辉煌目标的著名学者就这样消失了。一向景仰其学术发展并支持其“向党交心”的弟弟丁则民面对哥哥的离世，不仅无力为其冤屈申诉，还要立刻与之“畏罪自杀”划清界限，继续装成完全支持反右运动的样子。失去亲人的痛苦与时代政治的强力挤压叠加在一起压在一个人身上，其承受的痛苦之大实在是难以想象的，相信这种痛苦让丁则民终其一生都无法释然。

从互助组到高级社、人民公社的成立的历史过程，一直被我们作为中国农村现代化的中心内容从正面歌颂。虽然“大锅饭”、“共产风”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破坏生产力，但是却很少出现负面评价的研究成果。作者透过搜集到的来自吉林省怀德县（今属公主岭市）的两份文革前的历史记录，透视合作化以后农民在收入持续下降、缺衣少粮、无钱医病的艰辛状况下对合作社、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抵触和反抗的现实。岳崇娥是靠近长春的吉林省怀德县狍子洞村的一个农民，由于他勤劳苦干，并雇佣帮工，每年都能收获很多粮食，家境还算殷实。但是，加入合作社集体以后，整体劳动生产率下降，加之其家庭劳力少，每年分配到的粮食比之以往大幅度减少。家庭生活困难，被迫借债。为还款，他向合作社提出贷款，遭到合作社领导拒绝。不久，他借吉林省出现“退社”风潮的机会，向合作社提出退社请求。对此，合作社处理得还算理性，批准了他的要求。但是，基于合作社现时缺少资金，退社返还资金要分年给付。这一处理方式被岳崇娥拒绝，并将主持社务的干部刺死。吉林省委在处理此事时，依旧是稳妥的，没有将其上纲上线定为反革命，只是认定事件的发生除了肇事者“心胸狭隘”外，也与有关单位领导的“官僚主义”直接相关。从而避免了打击面的扩大，缓解了社会矛盾。但是，到了三年困难时期，与岳崇娥同村另一生产队又出现了“闹社”、退社风波。一个叫王长顺的农民，自从将牲口和土地交公入社后，心脏病逐渐加重，无力干重活，家庭生活越来越差。到1962年，在交完公粮后，一家所剩无几。并欠生产队和亲属外债近千元，上面分配下的“返销粮”（注：据我所知，我家乡九台县农村，我们家曾于1962年购买过分配的返销粮，其中竟有霉变为绿色的陈化玉米）无钱购买。王长顺由于家里没劳力，生产队的柴草也不给他家分配。寒冬腊月，北风劲吹，全家无粮无柴，真是饥寒交迫。在想不出其他办法的情况下，他提着铁棍找到队长，要求立即给他发放粮食和柴草。生产队不给，他就与队长及劝架者发生激烈冲突。大队书记得知后，为缓和局面，批准给其家发放粮食400斤。不久，中央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针对国内普遍存在的对大跃进造成的社会状况恶化的不满情绪，为规避社会矛盾爆发，转移

政治压力，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于是，王长顺的问题就变成了“阶级斗争”问题的反映。基层干部有了政治权威做依托，开始对王长顺强硬起来。当1963年返销粮分配下来后，队里得知王长顺仍旧拿不出钱来购买，便断然拒绝给他分配任何粮食。王长顺在反复交涉还是不能实现愿望的情况下，到队里强行牵出两匹马，作为他要求退社的偿还金。村社干部不仅不做任何缓和这一干群紧张问题的工作，还展开调查，搜集王长顺的“历史问题”。最后，以其曾于伪满时期在日伪的农事公司干活和屡次要求退社的事实，罗织了一个“为日寇服务，一贯敌视社会主义，打骂群众，品质恶劣”的系列罪名，送交公安部门进行“劳动教养”。“劳动教养”尚在酝酿之中，他即因病去世。王长顺悲惨的遭遇，是合作化之后千千万万个中国农民生存状态的一个缩影啊！

给当代中国人带来的最大一场劫难莫过于十年文革了，十年里，工厂停工，学校停课，暴力批斗“走资派”，全国南北大串联，派性武斗，城乡上下搞“清队”，各种运动此起彼伏，接连不断。国家经济停滞、倒退，民众生命和财产被剥夺、践踏，让无数人丧失了生命和家庭幸福。对于这个历史劫难，由于当年我们反思和清算得不够彻底，以后又一直作为“敏感问题”加以回避，所以，今天的年轻一代对这段历史几乎全然不知，甚至根本不相信这段政治荒唐，出现了群体性大范围的“历史虚无”；而有些在1960年代以前出生的“过来人”，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后的声色犬马、灯红酒绿“审美疲劳”和严重腐败、分配不公之后，又重新燃起了对曾拥有过的“乌托邦”幻影的追求；至于那些当年主导或参与打砸抢的邪恶者，他们非但一直将文革作为“盛世”怀念，还时刻等待党和国家为文革“平反”。那么，文革时期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我们应该怎样来建构这段历史？党中央已有定评。东平兄的三个长春文革画面从一个角度为这段特殊的历史做了一个非常客观的“公证”。

其一是武斗场景追忆。青年学生是文革武斗的主要参加者，长春因高校多，学生数量大，所以是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全国武斗活动较为严重的一个城市。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武斗伤亡达1000多人，一次武斗死亡达20余人，在大约三个月的长春武斗高潮期总共死亡400多人。50多年过去了，市民对武斗的情景和死难者的名字都失去记忆了。本书以一处墓地、一个武斗烧毁现场为我们提供了当时的惨烈景象。我们都知道重庆城市保留了一处全国唯一的武斗死难者墓地，其实在我们长春文化广场西北角的地质宫大楼西侧也曾经有过一个文革时期“长春公社”武斗死难者的墓地，但至于什么时候形成的，规模多大，何时被清理掉的？一般人都不清楚。本书作者依据当年记忆和搜集到的红卫兵组织保存的资料，以及对目击者的采访，将其基本过程大致搞清了。该墓地当时总面积不足一亩地，共埋葬了106个年轻生命。墓地出现于1967年8月上旬，能确认准确

日期是8月9日。一天中埋入最多的是8月18日、20日和21日，这三天分别埋入8人、7人、7人。书中形象化地记述了当时墓地的情景。“死亡者多以棺木装殓，黄土掩埋，坟前立一个写有名字或贴着相片的木质标识，墓地四周是一圈儿竹篱笆院墙”。“每有死亡者下葬，地质宫楼上的广播便反复播放通告和‘就义歌’（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插曲），以造声势，远近群众便涌入墓地围观。随着下葬者日益增多，不久后，在这片林地之南修建了一座墓碑，基座用砖石砌成，碑身则用木板搭建，高约十米，正面有仿毛泽东手书“死难烈士万岁”。有了东平兄费尽心力的搜集和这个考证，这些人的名字就永远保存在我们的城市记忆中了。

本书记述最惨烈的一个武斗场景是1967年9月18日长春火车站站前旅社的场面。1967年9月19日凌晨1时55分，“红二派”组织向东方红公社驻地的站前旅社发起攻击，动用了各种步枪、轻重机枪、六〇炮、八二迫击炮等武器。“红二派”在其广播台播放的《骑兵进行曲》的旋律配合下，向“东方红公社”驻地发起一次次进攻。20小时内，发射炮弹300余发，子弹数十万发。车站上空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十里以外即可见到。东方红派一方死伤惨重。伤100多人，死亡38人，其中“教大主义兵”死亡6人。炸、烧总面积达12万平方米，炸、烧单位包括铁路售票处、货物处、行李房、铁路仓库、站前旅社、省委招待所等近20个单位。烧毁包括悦来旅社大楼在内共计610多间房屋。这一悲惨事件震惊全国。

书中记述最多的还是1968年开始的清队运动。清队是一个极具反人性的历史过程，充满了法西斯暴行。以1968年5月长春农机公司的大规模非法审讯为例，审讯时，“三角带、皮带、胶皮管子、电线、木方子都用上了；（给每个被审者）蒙上眼睛，（让他们）互相打嘴巴，（彼此激发仇恨）；然后（逼其）跪砖头、站板凳（上）坐（作）‘喷气式’；再不解恨，就用铁丝拴大拇指上大挂，用绳子拴上两手吊起来在空中旋转；到后来，刑讯再次（进一步）升级，用铁钳子夹手指，把人吊起来用火烤，把铁箠篱和喷壶嘴烧红了往身上烫……”其残暴手段不胜枚举！最残酷的就是对“漏网地主”出身的职工王某的审讯，“连续20多个小时，王某及妻子、儿子、儿媳，以及17岁的孙女”，其家所有成员都作为逼供对象，一个个被打得鼻口流血，遍体鳞伤；有的几度昏迷，又用凉水浇醒；有的衬衣衬裤脱不下来，感染化脓。王某之妻三个多月不能翻身，王的三儿子腰部受伤，留下不敢弯腰的后遗症。儿媳苏某受刑讯后精神失常。“受伤最重的是主要审讯对象王某，”在5月22日到29日的8天时间里，遭受酷刑20余次，最长的一次达5个多小时，打得体无完肤，大便出血，不能进食。王某受刑不过，被迫承认说1948年在长春桂林路拾到手枪枪筒一支和几十发子

弹。5月29日下午3时，召开了批斗王某大会，王某被两个人拽着头发拖进会场，被人用脚踏着拍了照片。怀着“阶级仇恨”的人们蜂拥而上，拳脚棍棒交加，王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在被拖回监护室时，于当晚6时死亡。

长春地区从1968年5月至12月，在“清队”期间，“清”错的有数千人，全地区由于“清队”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929人。其中，打死和刑讯后致死184人，自杀1745人。尤以长春地区外五县的情况最为严重，自杀1031人，打死172人，共计1203人。

记述这些血淋淋的事实和大量的无辜者丧生过程，其目的决不是猎奇，而是为补充民间历史记述的遗漏和缺失的环节，试图协力建构出一个相对准确和真实并带有民间文化特征的政治运动史图谱，以能为我们从过去历史中汲取灾祸教训，避免那种惨绝人寰的暴行及悲剧的再次发生。因此，东平兄的搜集及其写作行为是一种具有特别意义的公共文化传播过程，这就是历史“见证”。

淘尽黄沙始见金，民间史料的搜集和研究工作是艰难的，但是，这项工作必须有人做，而且应该做好。

东平兄，做下去，历史和现实期待殷殷。

【书海泛舟】

为信史留痕

——《红叶满地》自序

姜东平

姜东平简介：1955年生，文革爆发时正上小学五年级。1967年升初中。1970年参军，历任报务员、电台台长、大连陆军学校通信教员。1985年转业，先后担任记者、副编审、吉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副巡视员。曾参与主编《以史为鉴——日本制造伪满洲国图证》《兵临城下的家书》《辙印深深——一个伪满军官的日记》（1—4卷）等30余部大型文史图书。利用20余年时间致力于搜集整理和研究当代吉林民间史料，在国内报纸及文史刊物上发表各类研究成果及文章50余万字；发表报告文学、通讯、散文等30余万字。

上世纪90年代，长春市义和路长长的街巷里，出现一处旧书交易市场。初时零零落落，而后引来更多书贩加盟，渐成规模。

每逢双休日，是长春旧书市约定俗成的“集日”，摊位自东向西，依道路两侧铺开，书山人海，格外热闹。大家喜爱这种地摊儿文化，汲汲于其中的养分，

各取所需，为己所用，其中乐趣，不足为外人道也。

旧书市还有一个雅号戏称“鬼市”，天不亮，人们就纷至沓来，手电光高低明灭，形同“鬼火”，因此叫它“鬼市”，也不冤枉。

旧书市不仅是书刊的集散地，还有很多珍贵的历史资料、照片、手稿之类掺杂其间，流向各处。这些资料是“运动”的产物，更是某一时期历史过程的真实记录，由于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或褒或贬，或抑或扬，是是非非，真伪难辨，所以在运动后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被纳入“销毁”之列，它的后果是，不仅销毁了强加于受害者身上的“诬蔑不实之词”，同时也将一些极有价值的记录一并销毁。我在书市所见的资料，正是侥幸流散出来的极少部分，更多的，或者遭到焚毁，或者化为纸浆，殊为可惜可叹。（右图：姜东平在整理修补收存的民间史料。）



我对搜集民间史料素有偏爱，旧书市为我提供了机会。周末去逛旧书摊儿，是我的最大乐趣，无论酷暑严寒，从不间断。

“民间史料”大抵是指普通民众的生活场景、风尚习俗、生存境遇等社会层面的历史记忆。近代改革者梁启超说过：“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参见《梁启超文集·中国之旧史》1902年2月8日）。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因其不能进入史官的视野而散佚阙如，成为空谷足音。

所谓普通民众，是由一个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构成的群体，这些“小人物”既对群体有着不可分离的依附性，又以独特的生存方式铺设着命运轨迹。

一个人、一个家庭的生存境遇、状态，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缩影，是丰富多彩的历史细节和未来走向的汨汨源头。因此，关注“小人物”，诠释“大历史”，是研究者不可或缺的社会责任。近年来，许多有识者致力于民间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从搜集民间史料入手，探赜“小人物”的历史记忆，复原更为宽阔的历史场景，或许能为史学领域的革故鼎新，开辟一条新路径。

搜集和整理民间史料，一方面为研究者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同时，又因史料的繁芜庞杂，往往被当成稗官野史之类，难以采信。因此，不可能将全部带有“历史印迹”的资料统统保存下来，要进行一定的筛选，剔除主观上认为毫无

意义的部分，从中发现有价值的东西。客观上，也会受到地域的限制，较易搜集的，是与本地区相关的史料，因此以本地史料为主，着眼于“小人物”的苦乐年华、悲欢离合，是较为明智的选择。

搜集史料，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也是一个“铢积寸累”的过程。有时，为了弄清一个细节，需要花费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做基础工作。记得有一次，我从书商手中接过一袋被撕得粉碎的“纸屑”，仔细翻看的结果，正是我所需要了解的内容，于是我利用数周时间，对它进行拼接和“复原”，终于弄清楚这一事件的始末。许多史料，就是通过这样途径得来的。

我之所以搜集民间史料，本意是为了“研究”它们，把早些年发生的某个事件和相关人物搞清楚、弄“明白”。史料是研究的基础，缺少它，所谓研究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文史资料不同于史学研究，但它却与史学研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史学研究要根据史料进行分析、匡误和论断，文史资料作为基础事实，对史学研究的影响是巨大的，因此，它所提供“细节”的真实性不容忽视。当你面对这些史料的时候，你俨然是一个历史的审判官，你的叙述和评断，都要以遵从史实为准绳，“有一分史实说一分话”。同时，走访当事人或知情人，把文字史料与口述史料结合起来，相互印证，去伪存真，也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只有这样，才能为史学研究提供一个较为准确的史实。这是我的一点感悟。整理和记录下来的史料，想来对于那些“缺失的部分”会有些许补益。

记忆是沟通历史的桥梁。我尝试着通过一些鲜为人知或不为人知的民间史料，把“小人物”和他们的经历，从社会的宏大背景之下细绎出来，揭示事物的本来面目和内在联系，或可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光和影，彰显出社会的真与假、美与丑、善与恶。将来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本书内容就是基于上述考虑连缀成集的。按照叙述方式大抵可分三类：其一，是作者亲历的“文革往事”，以及对“身边人物”的记述。如《母校罹祸记》记录了长春一所学校的兴衰过程。学校因办学方针出了问题，成为“培养修正主义子弟的苗圃”而被解体。《“武斗”的长春》通过作者的视觉，反映了长春武斗时期的混乱状态。《“特殊”教育》，非指现代意义上对体残智障者的“特殊教育”，而是通过作者的切身经历，反映了动乱年代对青年学生所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

《几个“典型”》记述了作者所在部队“学毛著”、“开讲用会”活动中，树立的几个虚假“典型”，他们的“光辉业绩”，最终成为海市蜃楼般的政治泡影。其二，披露在特殊的年代里，普通家庭的不幸遭遇。是作者根据多年蒐集的当代史资料，整理、撰写的“凡人小事”，看似微不足道，却可粗识“对敌斗争”的崖略。《“清队”纪事》，通过一些典型事件，反映长春“清队”时期的历史背景，以及这些典型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例如《“破镜”难圆》、《一个家庭的遭遇》记述了

由于家庭矛盾、互相揭发、“跟队划线”而引发的冤案。《“自杀就是叛党”》是一次“批斗会”的真实记录。文革中，自杀即意味着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于是对“自杀未遂者”的批斗，就成了清队中最冷酷的一幕。其三，是根据档案资料，撷取其中较为完整和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和人物，整理并撰写的史料。如《“拉马退社”的悲剧》是关于一个普通农民因生活窘迫而闹“退社”，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最后抑郁而终的事件。《一份档案与一个生命》叙述了一个清华大学毕业生由于家庭历史“极其复杂”，在某厂担任技术员期间，被当作“特务嫌疑”长期监控，导致精神失常，最终惨死于独身宿舍。

这些复杂的事件，初看零零散散、杂乱无章，然而，墨楮之间所出现的人物，饱尝运动之苦，自身备受煎熬，亲朋好友遭受株连。这些陈年往事一经整理出来，则令我浮想联翩，震惊、愤慨、气闷、感叹……我要做的，是在字迹间寻找事实，做出合理的解释。把那些纷纭复杂的内容梳理清楚，仿佛用心在倾听他们的言说，颇费工夫和心血。

现在，搜集资料的路径和条件都发生了悄然的变化。

一是可供度藏的资料越来越少。持有者看重它们价格不菲，自视奇货可居，沽求善价。这些民间史料和山珍海味一样“腾贵”起来，甚至超过十倍百倍，真正成了“片纸如金”。早些年不入眼的传单、小报之类几近绝迹，何况那些手稿和专卷呢，更是杳如黄鹤。

二是旧书市场在几次迁移中备受打击，前景堪忧。义和路旧书市场存在不到十年光景，有关部门就以“占道”、“阻碍交通”的名义加以取缔，而后，旧书市场先后迁移到省图书馆后院、“雅居”花鸟鱼市、西解放立交桥轻轨站点等几处场所，每一次迁移，就受到一次打击，元气大伤，最终分散于华联商厦、“和平大世界”商场和解放桥下各处。

我闹不明白，为什么旧书市场不能拥有一处安席之地？

好在，20余年所搜集的资料，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已非常可观，足够我整理“研究”之用了。我所担心的是，在有生之年，来不及整理它们，致使更多史料湮没无闻。现在，我每天在这些资料里忙忙碌碌，与各色人物交谈，我熟悉他们，或许他们对我也不陌生。我从未想过放弃，那些人物，时刻在渐行渐远的年代里，向我招手呼唤……

2014年7月6日写于寓所

【书海泛舟】

罹难者墓地

（《红叶满地》选读）

姜东平

我在 2009 年 5 月远足巴蜀，特地往瞻了重庆的“文革墓地”。

巴蜀之行与我蒐集的文革史料有一定关联。长春文革武斗时期，也曾有一处集中掩埋武斗罹难者的墓地。彼此之间，所处年代相同，所发事件亦颇多相似。从目前获得的资料和信息上看，重庆“文革墓地”是现今全国仅存的一处，已于 2009 年 12 月列为“重庆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那些因历史原因消失的“文革墓地”，虽然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但仍有相关的文字和图片资料，散见于各地民间，可资印证和补益。

长春武斗时期，由于两派群众组织画地为营的割据态势，罹难者遗体不能及时运出市区，往往采取就地掩埋的应急措施，分散埋葬于市区的闲置地。较为集中的一处，坐落在树木掩映的地质宫西侧，是长春公社的“烈士”公墓。这座公墓建造于 1967 年武斗时期，存在时间不过一年光景，即于 1968 年 9 月 30 日前拆除，所有坟墓均由市区迁出，遗体送朝阳沟火葬场火化。因为那年国庆，要在地质宫门前的广场举行庆祝活动。

地质宫位于长春市区中心地带，早些年这里被称为“杏花村”，植被茂密，景色宜人。伪满洲国初期，溥仪在杏花村举行“祭天”仪式，当了日本人卵翼下的傀儡皇帝。1940 年，日本人在杏花村选址为溥仪建造“第二皇宫”，工程刚刚进行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伪满财政捉襟见肘，工程不得不停顿下来。1954 年，经国家计委批准，在原工程的基础上，建造了一座中西合璧式的建筑，成为长春地质学院的教学和办公之所，从此有了“地质宫”的称谓。

文革期间，由于地质宫被一派学生组织占据，又因处于两派群众组织所占地区的“接合部”，成为长春武斗事件的焦点。

两派群众组织

1967 年“一月风暴”（又称“一月夺权”）之后，长春的大专院校、机关团体、厂矿企业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形势下，逐渐分化为两大派四个群众组织，即：

（1）“红色造反者长春市红卫兵总部”（二总部）。长春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联合组织。自称是各校“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革命造反派”，造反初期，与“红卫兵长春市总部”（一总部，因其办公地点设在护国般若寺，又称“大庙总部”）发生矛盾并分裂出来，于 1966 年 9 月 22 日宣布成立。初时万余人，一

年后，发展到 10 余万人，占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总人数的 70%以上。

“一总部”和“三总部”，先后于 1966 年 12 月和 1967 年 1 月宣布解散。

(2) “红色造反者吉林省革命委员会”(红革会)。以工农为主体，以“二总部”为中坚的群众组织。初由“二总部”和第一汽车厂等单位群众组织倡议，于 1967 年 2 月 5 日成立。一年后，由成立时的 32 个组织 5 万多人，发展到 1000 余个组织 89 万人，其中长春市 38 万，占全市职工、农民、学生总数的 62%，此外，还有“红少年革命造反大军”20 万；辽源市和德惠、通化地区已成立“红革会”，并参加了“省红革会”，约 31 万人。

(3) “长春公社”。以退出“二总部”的“长春地质学院毛泽东思想战斗兵团”(简称“地院兵团”)与“吉林工业大学革命造反大军”(简称“工大造大”)、“光机学院‘八一五’野战军”(简称“光机八一五”)、“东北人民大学(即吉林大学)红旗野战军”(简称“人大红野”)为骨干与核心，并称为“地、工、光、野”，社员约 5 万多人。

(4) “东方红公社”。以“毛泽东主义教育大学(即东北师范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简称“教大主义兵”)为核心的群众组织，在校内死保党委第一书记黄彦平，得到省市部分领导支持。约 3000 人。

“红革会”与“二总部”因思想观点的基本一致，在数量上占有绝对的优势，成为同一派的群众组织，被称为“红二派”，同时又被不同观点的另一派蔑称为“黑二保”(即保皇派)；“长春公社”与“东方红公社”因思想观点大体相同，而成为同一派群众组织，被称为“公社派”，同时又被不同观点的另一派称为“流氓黑社”。

武斗事件

1967 年 6 月至同年 11 月，是长春武斗最为激烈的时期，两大派群众组织由最初的唇枪舌战，演变成为真枪实弹的大规模武斗。

1967 年 6 月 15 日，“长春公社”所属“地、工、光、野”等群众组织冲击了长春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单位)，指责公安局军管会支一派打一派，包庇、怂恿市公安局“红色造反团”，逮捕、扣押、游斗与他们观点不同的革命工人、学生、干部及群众，酿成多起武斗事件，并打死重工业技校教师林默然。要求公安局军管会严惩肇事者和杀人凶手。这是两派分裂以来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武斗事件，双方在市公安局发生武斗，伤者近 1500 余人。

7 月 5 日，两派群众组织在长春市医院发生武斗，持续 3 天，造成国家财产损失 20 余万元，打伤 690 多人，重伤 102 人，烧毁云梯消防车一辆(吉林省地

方志编委会统计数字)。

7月14日长春铁路因发生武斗，停运10天，造成长大干线物资大量积压，国际列车不能通行，援越物资不能运出，直接损失6亿元以上。

由于武斗的不断升级，两派群众组织开始抢夺武器。

8月11日，“红二派”组织拦截部队车辆，抢走车上的轻重武器和弹药。市区内多处武装部门也同时遭到抢劫。“长春公社”派群众组织袭击了长春市英俊区（今二道河子区）武装部和长春拖拉机厂武装部，抢走大批武器。8月13日，“长春公社”派军事院校组织及其他群众组织数千人，袭击了第五坦克学校军械库，将三个仓库抢劫一空，仅机枪就抢走170挺，其中高射机枪50挺。

8月14日，“二总部”所属近千人，乘50辆汽车，洗劫了解放军白虎屯武器库。据不完全统计，自8月9日至14日的5天里，长春市共发生40多起抢夺部队及武装部的武器事件。

抢夺武器预示着最初的“冷兵器”作战已经转化为现代化武器的角逐。1967年8月13日，第五坦克学校“红革”战士耿国兴，成为第一个中枪而亡的武斗罹难者。

9月13日，长春市起重机厂等10多个单位及“二总部”300多人，使用轻机枪、重机枪、六〇炮、炸药包等轻重武器，袭击英俊区“长春公社”驻地吉林省建筑一公司“小白楼”，死2人。“公社派”组织出动四辆坦克车增援小白楼。

9月19日凌晨1时55分，“红二派”组织向东方红公社驻地（站前旅社）发起攻击。动用了各种步枪、轻重机枪，六〇炮、八二迫击炮等武器。仅20小时内，即发射炮弹300余发，子弹数十万发。死伤惨重。“红二派”在其广播台《骑兵进行曲》的旋律陪衬下，向“东方红公社”驻地发起一次次攻击。车站上空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十里以外即可见到。

由长春市公安局“联合总部”《九一八事件》调查组1967年9月21日调查显示：

炸、烧地区：从东一条往西，胜利大街以北、站前广场以东，北到车站货物处。

炸、烧面积：方圆12万平方公尺。

炸、烧单位：铁路售票处、货物处、行李房、铁路仓库、站前旅社、省委招待所、站前派出所、三轮车社、人民旅社、站前饭店、市人委招待所、客运站、南京大街副食商店、悦来栈，物资出入管理所、站前售货亭、汽车调度站、市运输转运站、包装组，共近20个单位。烧毁站前610多间房屋。

炸、烧居民住宅：站前4委39组、40组、41组、42组，共4个居民组约160多户，170多间房子烧毁。

炸毁汽车：共 3 台。南京大街 1 台，大门前 1 台，东一条 1 台。

死伤居民，伤 50 多人，死亡 20 多人。

“长春公社”和“东方红公社”伤 100 多人，死亡 38 人，其中“教大主义兵”死亡 6 人。

10 月 4 日，吉林省国防体育俱乐部及省篮球队 15 人去某农场打猎。携带各种枪支 30 余枝，所乘车辆行至农安伏龙泉镇时，被当地群众组织“全无敌红联总部”拦劫，搜查时发现了枪支，随即将车辆及枪支弹药扣压，又将被扣人员分别关押、审讯、殴打。经交涉，“全无敌”先后将羁押人员放回，但仍扣留所有枪支弹药及一台吉普车。国防俱乐部会同省军区派员多次与“全无敌”商讨归还被扣车辆及武器，未果。由此而产生的矛盾加深，导致冲突的升级，酿成枪战，双方死亡人员及无辜群众计 10 人，伤 20 余人。

据当年长春市革委会某副主任在讲话中称：长春地区因武斗死亡者 400 多人。1978 年 8 月，吉林省委宣传部在清理“打、砸、抢”分子的会议上披露，长春市在“三案”（冤、假、错案）和武斗中死亡者 14000 余人。

“美 30，真上线”

长春市南关区和二道河子区，以流经市区的伊通河为分界，横亘东西的南关大桥（后改称长春大桥），是两区之间的咽喉要道。1948 年围困长春期间，国民党 60 军就在这里设了卡哨。出了卡哨的百姓，许多被饿死在“三不管”地区。1967 年 8 月之后，由于两派武斗，“红二”派组织亦在此设卡，封堵“公社”派组织进入城区的道路。这项任务是由二总部总勤务员刘致国布置的，为此，他还专门到桥头巡视，对守桥人员进行战前动员。负责守桥的是建工部技校的青年学生和长春自行车厂、棉织厂等一些企业的“红二”派人员 30 人左右，在南关浴池屋顶以及周边搭建了简易工事，还配备了多挺机枪，以及数门八二迫击炮等。

1967 年 9 月 18 日，这一天正是旧历八月十五中秋节。下午时分，守桥人员接到密报称：两个“公社”派人员从东面往市区而来“搜集情报”，提醒守桥者注意。不久，果然看见有两人向桥上走来。负责守桥人员立刻上前盘查。其中一人见事不妙乘乱溜掉。剩下那人很不情愿地将一把手枪扔到地上。当一名守桥人员俯身拾枪时，那人突然从衣袋里掏出另一支手枪来，对准拾枪者的脑门连扣两下扳机，拾枪者被吓得面如土色，出了一身冷汗，其他人纷纷逃散，找地方躲起来。原来，情急之下，那人忘记打开保险，枪没有打响。那人转身向桥的东侧跑去。这时，躲在桥栏附近的守桥人员立即以桥栏为依托，向那人开枪射击。那人刚跑到桥下的拐弯处，即被枪弹射中倒地。守桥人员中，有一个被叫作“财迷”

的，最先跑到中枪者身边，从那人手中取下一支五四式手枪。一位建工部技校的学生边向倒地者跑过去边说：“嘿，美 30，真上线”。

“美 30”，是指一种口径为 0.30 英寸的美式步枪，8 月以来，两派组织到各地的武器库抢夺枪支弹药，武装自己的派别组织，成为武斗事件的杀人利器。

中枪者被紧急送往“四六一”医院，途中已经死亡，医院拒收，只好又拉回桥头，草草埋葬于桥南护坡处。

1968 年，在对这一事件展开调查时，事件制造者们再也不把开枪致人死命当成炫耀的资本，而推说与自己无关。守桥者同派别组织的驻地设在南关浴池。他们同时还犯下多条罪行：一是随意抓捕过往之无辜群众进行刑讯殴打，其中多人被毒打致死。二是在南关客运站与对立派遭遇时，射杀二人。三是参与了多起武斗事件。

“高坟正蕉峣”

“长春公社”墓地，占地面积不足一亩，共埋葬武斗罹难者 106 人。死者几



乎都是在 8 月之后下葬的，因为那时武斗事件频发，枪声终日不断。

死亡者多以棺木装殓，黄土掩埋，坟前立一个写有名字或贴着相片的木质标识，墓地四周是一圈儿竹篱笆院墙。每有死亡者下葬，地质宫楼上的广播便反复播放通告和“就义歌”（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插曲），以造声势，扩大影

响。远近群众便涌入墓地围观。（上图：武装护送“烈士”入殓的游行队伍。）

2014 年 9 月 17 日是九一八事变纪念日前夕，按照往年的惯例，单位在文化广场举办东北的沦陷与抗战图片展览。地点选在这个地方，距当年的武斗墓葬群只隔着一个篮球场。我遇见一位老者仔细地观看着每一幅历史照片，并且对我说，举办这样的展览很有意义，年代久远，很多年轻人都不了解当年所发生的事情。我得知老者是长春地质学院（现属吉林大学）的老职工，是从图书馆书记任上退休的，叫孙玉庭，近 80 岁的年纪，精神矍铄且十分健谈。他对我说，文革武斗时期，他住在地质宫楼上。那里正是“地院兵团”驻地，因此我猜想他曾是兵

团的成员吧。他肯定地对我说，长春公社墓地埋葬了 106 人。有关坟墓迁出的时间是在 1967 年国庆节前的头五天。这与我当年迁坟时间的回忆是吻合的。孙先生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因此他的口述是可信的。

笔者根据手边资料，整理了一份“长春公社墓地下葬者名单”，对分散掩埋于各处的两派武斗死亡者也作了粗略统计。当然，这份名单很难做到准确无误，比如说，仅 1967 年 8 月 20、21 日两天，每天都有 7 人下葬于“长春公社”墓地（参见吉林省红革会 1967 年 8 月“大事记”），而“名单”中，至少有 5 人失于记载。因此真正要把这些数字还原成具体的人和事，恐非一人之力所能及也，惟期知情者补遗之。

《长春公社墓地下葬者名单》：

武焕祥，“长春公社第一汽车厂分社”常委、发起人之一。1967 年 7 月 26 日，武焕祥与分社人员同乘汽车到市内，参加“长春公社”热烈庆祝谢富治、王力回到北京，坚决支持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的集会，途中遭到“红二派”人员绑架，被殴打后用刀刺死。按照死亡时间推断，武焕祥是最早葬于长春公社墓地者。

马振洲，“地院兵团”成员。1967 年 7 月 22 日，马振洲随兵团数人乘车去人民面粉厂（有资料显示称去抢夺面粉），遭遇“红二派”组织连续 3 天的围攻，马振洲负伤身亡。

戴树恩，“地院兵团”成员。1967 年 7 月 29 日，“红二派”攻打“工大造大”等“长春公社派”组织驻守的该校造反楼，驻守校西门的戴树恩在混战中被打死。

徐义增，长春十二中“保卫毛主席不要命”战斗队常委。1967 年 8 月 1 日，在增援工大武斗途中翻车身亡。

孙玉波，“长春公社煤气公司革委会”常委；（右图：1967 年 8 月 9 日长春公社在站前广场召开孙玉波等“五烈士”追悼大会。）



肖克信，长春铁路分局电务段“革命造反兵团”成员；

徐永庆，长春铁路分局电务段“革命造反兵团”成员；

谢元刚，长春铁路分局电务段“革命造反兵团”成员；

许忠，长春变压器厂“无产阶级革命委员会”成员。

1967 年 8 月 8 日，“长春公社”在地质宫前集会，庆祝“十六条”发表一周

年，会后举行武装游行，行至三马路附近，“红二派”汽运公司车队冲入人群，双方发生武斗，冲突中孙玉波、许忠被长矛刺中身亡，肖克信、徐永庆、谢元刚被汽车压死。

张明贵，“长春公社汽车厂分社车轮大军”成员；

邓万民，“长春公社汽车厂分社发动机大军”成员；

程亚范，“长春公社汽车厂分社随车工具大军”成员；（下图：程亚范墓的墓碑与花圈。）



张金海，“长春公社汽车厂分社汽车工具厂”成员；

谭业忠，长春第一汽车厂工人；

齐明禹，“长春公社柴油机厂井冈山战斗队”成员；

向承志，“长春公社新十中公社”常委；

王文采，“长铁分社

‘火车头’造反大军”成员；

1967年8月18日张明贵等数十人乘车自郊区抢运物资返回途中，经过“红革会”所属机车厂时，遭厂区楼内机枪扫射，张明贵、邓万民、程亚范、张金海、谭业忠、齐明禹、向承志（一说在8月16日武斗中中弹身亡）、王文采等8人中弹身亡。

于友香，“长春公社汽车厂分社”工人。1967年8月19日，在机车厂武斗中，遭“红二派”机车厂群众组织机枪扫射，与张庆坤（埋葬地点不详）同时中弹身亡。

黄海，长春十二中“保卫毛主席不要命”战斗队第一大队队长。1967年8月21日，在驻守地质宫时，被枪弹击中身亡。

张树彪，长春四十九中学生。1967年8月与“公社派”组织驻守长春市医院，因没有武器，与同一派组织去橡胶八厂抢枪，在枪战中被打死。

张铁新，“长春公社保温材料厂红联兵团”成员。1967年8月25日下午5时，与“红二派”代表在铁路公安处举行停火谈判，未达成协议。张退出时，即遭“红二派”射击，中弹身亡。

刘立新，“长春公社市肉类加工厂红光分厂造反兵团”成员。1967年8月25

日，在市屠宰厂门前被“红二派”组织开枪打死。

高广库，“长春公社粮食学校红色造反团”成员；

孙寿南，“长春公社吉林省粮食厅联合造反大军”成员；

1967年8月27日，高广库在与“红二派”组织武斗中死亡，孙寿南奉命为高广库置备棺木，回家途中，被“红二派”组织开枪击中身亡。

郑明龙，“长春公社汽车厂分社”常委。1967年8月29日，在国防体协武斗枪战中中弹身亡。

张玉杰，组织名称与死亡原因不详。

赵振国，“长春橡胶厂红总部”成员。1967年8月29日，“红二派”组织攻击长春市医院，互射中，赵振国被枪弹击中身亡。

于彪，“长春市砖瓦厂毛泽东思想战斗兵团”成员。1967年8月29日去农安县衣家窑途中，被“红二派”开枪打死。

类树柏，“长春市木材公司革命造反大军”成员；

杨忠田，“长春市木材公司革命造反大军”成员。

1967年9月15日早8时，类、杨二人与同一派组织数人乘车回木材公司拉汽油，途经市打蛋厂门前，二人被“红二派”组织枪击身亡。9月17日同时下葬于地质宫西侧。

韩德成（组织名称不详），1967年9月16日晚，在西五马路附近遭遇“红二派”伏击，双方发生武斗，韩德成中弹身亡，年19岁。

杨水波，“地院兵团131战斗队”成员，在“兵团”野战医院工作。1967年9月24日，从四楼电梯间跌落到一楼身亡。

缪文朝，“地院兵团”成员。缪文朝是长春市两派武斗时期较早死亡者之一，又是最后一位被埋葬于“长春公社”墓地的“烈士”。1967年7月5日，长春市医院发生武斗，缪文朝被“红二派”抓住，送往医大“红二派”驻守的基础楼，缪被毒打致死，尸体被硫酸烧得面目皆非。几经交涉，于同年10月11日将尸体运回“地院兵团”驻地——地质宫。10月30日，“长春公社”为缪文朝举行了公祭大会，并抬棺游行，下葬于地质宫西侧“长春公社”墓地。

于占琛，“工大造大”69中队4大队队长。1967年7月29日，在“红二派”围攻工大造大武斗中，被“红二派”抓捕，遭到毒打，并用开水烫死后投入伊通河里。

魏占奎，“工大造大”三大队成员。1967年7月29日，在“红二派”围攻“工大造大”武斗中，被“红二派”抓捕毒打致死。

徐连起，“工大造大”69中队队长，1967年8月1日被“红二派”抓捕，毒打致死。

吴康，“工大造大”成员。1967年8月23日，“师大造大”围攻“返校闹革命”的“师大红旗”占地体育系大楼，吴康随队前往增援，不幸被枪弹击中身亡。

齐文英，辽宁省新民县人。“工大造大”1大队6705小队成员。1967年9月23日上午去桦甸分校报到。于校门附近，驻守403所的“红二派”组织突然开枪射击，齐文英身中4枪，延至26日上午死亡。

王泉林，“工大造大”机械一系教工中队队长。1967年8月20日在平台上被该校另一派组织“红造大”开枪击中头部死亡。

于占琛等6人葬于吉林工业大学“造反楼”西侧树林，“工大造大”墓地。

杨生发，“人大红野”成员。1967年7月12日在宿舍门前被逆向驶入自行车道的“红二派”汽车撞死。

黄维鸣，“人大红野”成员。1967年7月19日被“红二派”打死（指其去东光粮店抢粮）。

刘铁镑，“人大红野”成员。1967年8月15日被本校“红造大”人员开枪打死。

以上3人葬于“人大红野”宿舍楼前。

（另据网上“明月城”撰文称：一份长春公社烈士名单记载：1967年7月5日到9月2日的死亡名单，共计43人，即：缪文朝、顾成义、陈殿英、杨生发、徐义增、于化春、于占琛、肖克信、谢元刚、徐永庆、孙月波、许忠、黄唯鸣、武焕扬、戴树恩、魏占奎、马振洲、刘铁镑、张明贵、程亚范、张金海、谭业忠、齐明禹、向永忠、王文采、于有香、张庆坤、王泉林、黄海、张树彪、吴康、张铁新、刘力新、高广库、孙寿南、黄尚志、于彪、张凯宁、赵振国、郑明龙、甘凤龙、杨业升）

“红二派”罹难者

“红二派”群众组织在武斗中死亡人员，因没有建立较为集中的墓地，大都分散埋葬于本派别组织的驻地。武斗死亡事件是双方面的，笔者仅就“红二派”武斗死亡者作一粗略统计：

任殿甲，“长春师范大学革命造反大军总部”勤务员。1967年7月13日，“长春公社”抓捕机车厂“红二派”机车厂6名常委，4000多人被逐出工厂，由此引发两派武斗。任殿甲在武斗中死亡，年23岁。

孟庆学，长春冶金地质专科学校“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战斗队”成员，1967年7月17日被本校“造反兵团”勒死。

刘淑英，吉林省交通运输局干部，未参加群众组织。1967年7月5日，长春市医院武斗，刘淑英随众前往围观。被“地院兵团”抓捕，7月18日死亡。年33岁。遗下4个孩子，大的11岁，小的1岁半。

姜福林、宋国柱，长春市人委机关“联合造反兵团民政分团机关农场支队”成员。“七五事件”中，该组织成员13人被抓进“地院兵团”驻地，指其二人为劳改释放犯，参与武斗，并在地质宫四楼平台上“展览”示众，后被打致死。1967年7月28日“红二派”为姜福林、宋国柱举行了追悼会。

张忠诚，“农大造大”成员。1967年7月26日下午2时许，“红革会汽车厂总指挥部”召开庆祝“一二六”指示精神大会，“农大造大”乘车赴会，途中被“长春公社”组织绑架，19人被抓。张忠诚被打死。

顾顺伯，“防化学院红色总部”成员。1967年7月29日，“防化学院红色总部”去铁北面粉厂，与“防化学院‘105’战斗队”发生武斗，顾顺伯胸部被长矛刺穿死亡。8月12日“防化学院红色总部”在本院礼堂召开追悼会。

王祚延，吉林工业大学“红色造反大军”成员。1967年8月5日回校区宿舍取行李，路遇“工大造大”武斗人员，被刺十余枪死亡。当晚“红造大”在汽车楼前召开全军誓师大会，宣誓与“长春公社”血战到底。8月7日下午3时，“二总部”约两万人在人民广场召开追悼王祚延大会。

耿国兴，第五坦克学校“红革”成员。1967年8月13日，坦克学校“125”战斗队与其他军校组织及“长春公社”四五千人员，出动坦克等，围攻“红革”驻地，耿国兴中弹身亡。

齐洪飞，“红革会面粉厂联合造大”成员。1967年8月15日在新发广场因张贴大字报引起两派冲突，齐洪飞被手榴弹炸死。

冯国举，“二总部工大红造大‘碧血丹心’战斗组”成员。1967年8月16日下午4时许，“地院兵团”13辆汽车到军区第四仓库抢夺武器，两派发生武斗，死伤5人。冯国举身中7弹，腰部被子弹炸开，肠子流出，于当晚9时身亡。

孙光馥，“红革会市油毡厂”工人，奉命守卫东北人民大学印刷厂。1967年8月17日，在三楼平台上被来自省物资局大楼（“人大红野”守楼人员）的枪弹击中死亡。

范明生、李景和，“二总部”长春光机学院学生。1967年8月18日夜，“二总部”汽车去白虎屯军火库抢劫枪支弹药，途经汽车厂十栋，驻守在那里的同一派群众组织突然开枪射击，范明生、李景和中弹身亡。善后，范明生、李景和家属各得抚恤金2500元。

张宝才，长春“电业造大”成员。1967年8月27日晚9时许，“电业造大”驻地被“电业兵团”围攻，张宝才头部中弹身亡。

王丽珍，“红革会”成员。1967年9月2日，长春市医院、长春饭店（长春公社占据）与市人委大楼、五商店（红二派占据）枪战，互射一夜，王丽珍中弹身亡。

刘宝昌、王淑玉，“电业造大”成员。1967年9月2日被抓到“地院兵团”驻地，毒打致死。

沙永灿，“红革会”柴油机厂群众组织成员。1967年9月4日下午，“长春公社柴油机厂造反大军”闯入沙永灿家，连开数枪，沙永灿身中4弹死亡。

9月8日上午9时，“红二派”组织召开追悼刘宝昌、王淑玉、崔凤林、洪泽治、王玉章、刘德彬、王友良大会。

张亚顺，“红革会英俊区红旗公社”群众组织成员。1967年9月10日下午2时，乘车回生产队，途经坦克学校门前，突遭校内另一派军校组织开枪射击，张亚顺身中二弹，于当晚死亡。（下图：人们正为武斗罹难者抬棺下葬。）



刘喜义，“长春第一汽车厂总指挥部修缮直属兵团”成员。1967年9月14日回厂途中遭遇袭击，中弹身亡。葬于汽车厂铸造分厂东南角。

侯德华、李荣珊，长春市委党校职工，1967年9月15日，乘车外出拉地瓜，车上18人。途经铁北机车厂小白楼，“长春公社”机车厂群众组织开枪射击，侯德华、李荣珊被打死。伤6人。

杨凤军，长铁大修段工人，“红革会”群众组织成员。1967年9月16日上午，长铁分局两辆汽车经过汽车公司时，与“长春公社”发生武斗，杨凤军中弹身亡。

1967年9月17日，长春市朝鲜族中学发生武斗，死亡6人。

同日，“长春公社”500余人乘11辆汽车去双阳县参加武斗，增援县“公社派”群众组织，县“红革会”常委崔祥中弹身亡。伤多人。

1967年9月18日，长春车站武斗，国防护路队炊事班长曹荣和中弹身亡。

李文金，“红革会”汽修厂工人，驻守省委大院。1967年9月23日上午，“防化学院‘105’战斗队”向省委大院开枪，将李文金打死。

胡鸣雅，“东北人大红造大”常委。1967年9月18日车站武斗中弹身亡，

掩埋于校园东侧（今牡丹园内）六角亭前。

宁辉，“二总部”常委、“长春五十中造大”常委。1967年11月15日夜，“二总部”数百人进攻“长春公社”医大“八一八野战军”供应处驻地，宁辉中弹身亡。掩埋于医大校部西南角。

王兰亭，“长春机械厂红色总部”勤务员，1967年9月25日，以“长春机械厂红色总部”为主力，去农安县哈拉海参加武斗，双方动用了枪炮，王兰亭中弹身亡。

此外，还有一些解放军战士，他们在支左中奉命“五不一宣传”（即吵不动气、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打伤不开枪、出入不带枪；宣传毛泽东思想），在武斗最烈的7、8、9三个月里，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在两派之间斡旋、调停，抢救被围攻一方的武斗人员和群众。死于枪弹者难以计数。试举一例：

1967年8月28日晚，驻长3009部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辆汽车在和平大路南行，到汽车厂74栋，“汽车厂修缮直属兵团”突然开火，用机枪向汽车扫射，战士**盛俊忠**中弹牺牲。

1968年9月，省市两级“革委会”发出通知，9月30日之前，将所有掩埋于市区的武斗死亡者坟墓迁出，遗体进行火化。斯时，正值全国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时期，大批“牛鬼蛇神”由“群众专政”人员押解着，前往墓地迁坟。

白杨依旧，人事已非。踌躇地质宫西侧，曾经的武斗罹难者墓地，一对情侣在白杨树下依偎，几位老人在打着太极拳。人生就是这样命运多舛，复杂多变。

在重庆的文革墓地，有人在竹茎上镌刻了一首绝句：

高碑矮文密麻麻，鸛鵒声里落日斜。
地下冤魂知不知，一腔热血为谁洒？

鸛鵒在啼唤着：“行不得也么哥”，逝去者，却义无反顾。

北方的秋天，听不到鸛鵒的鸣叫，只有成群的老鸛落在高大的白杨树上，叫着斜阳，叫着满地黄叶。

我的眼前浮现着刘彤阳的灵车；抬着宁辉遗体的担架行过；被强制去迁坟的“牛鬼蛇神”们疲惫的身影……

我想，那些曾经扮演过“英雄”角色的“烈士”们，虽然没有马革裹尸的悲壮，甚至死得一文不值，但他们总该有一个安身之所，或者在嗣后的记述中提到一笔的。

具有历史价值的一本新书 ——推荐《文革中的山西》

柳溪公

以山西一些文革亲历者的记忆与反思为内容，由石名岗执笔、香港天马出版社出版的《文革中的山西》一书，最近与读者见面了。

这是由许多人参与、经过四年多的孕育诞生的严肃、慎重的作品，是史实与理论并重，回忆与反思兼有，探讨与批判齐备的著作。

这本书的写作，从酝酿、构思，采访、取材，搜集、研究……一直到成文后的讨论、修改，一步一步扎实推进，一节一章反复推敲，史实力求真确，思想努力创新。写出初稿后又广泛征求当事者、知情人的意见，经过国内一些研究文革的专家、学者的指导，最后才定稿付印成书。

这是全国第一本由文革亲历者写成的有关一个省域的文革史，是众多参与者的 心血与汗水的结晶。它有以下特点：

第一、明确的责任感

将近五十年快过去了，文革的亲历者，大多年逾花甲，不少人已七老八十。那段刻骨铭心的往事，现在的年轻人不知，许多人淡忘，官方涉史者歪曲，亲身经历者能记得起、理得清、说得出，但可能时日不多。时间的紧迫，历史的要求，使参与本书写作的文革亲历者抱着“抢救”的态度，怀有强烈的责任感，以期留给后人一个比较真实的山西文革史。

第二、鲜明的针对性

山西官方的涉史机构和研究院所，依据官方的需要和旨意，歪曲历史，为在山西作恶的一些政客隐恶扬“善”，文过饰非，混淆视听，欺骗群众。文革亲历者是历史的见证人，必须义不容辞地站出来说话，揭示真相，正本清源。

第三、开阔的视野

本书开始构思时就确定指导思想：立足山西看全国，放眼全国看山西。比如写山西 1·12 夺权，联系上海刮起的“一月风暴”；写 4·14 “炮轰刘陈刘”发展到“七月会议”中“炮打张日清”，联系“武汉陈再道事件”。这样，就能进一步看清事件的本质和与全国文革的关系。

第四、释疑解惑揭开谜团

文革中发生的大事，有的扑朔迷离，难知真相。这本书写作时，作者们通过调查研究，查阅资料，获得了不少有价值的信息，解开了一些谜团。如 1·12

夺权是毛泽东直接指示，周恩来、康生面见刘格平直接授意的。陈永贵的反动身份，是中纪委三次和中组部两次联合调查落实，由调查组成员陈英茨先生著写《陈永贵本事》一书，在香港出版公诸于世的。晋中“任王张集团”的形成，和陈永贵的勾结，文革中组建“六十八军”参加武斗，都是第一次系统、详细地告诉给读者的。文革中红联站抓捕杨承孝、陈永贵被困平遥城、红字号伏击抓获李顺达、临汾“1·26”派爆炸地委大楼等重大事件都有详细记载。

第五、展示山西文革的特殊与曲折

山西文革非常特殊，因此也导致曲折和复杂。

首先，文革的发动者毛泽东，在文革中首要打倒刘少奇。要打倒刘少奇，炮制的第一罪状和最大罪名就是“叛徒”。而定这一罪状牵涉的“六十一个叛徒”的第一人，就是山西籍的、插手山西工作很深的簿一波。而根据政治需要，必须人为树立和刘少奇“活命哲学”坚决斗争的、“要把牢底坐穿”的“英雄”，符合这一要求的刘格平当时正被贬在山西，这就造成毛泽东要搞夺权先从山西开刀，形成“全国第一夺”的结果。

刘格平无德、无能、无为，但中央要树这面旗，导致“刘陈刘”、张日清先后倒台。陈永贵反动的历史身份，“九大”前已经查清上报中央，当时中央置之不理，陈永贵一直升官，并操控山西政局，说明当时毛泽东、党中央都是从政治需要出发，根本不讲是非。

谢振华抵制大寨极左错误，跟着周恩来批极左，冒犯了“四人帮”。“四人帮”需要陈永贵和大寨这面红旗，江青就制造“三上桃峰”事件，“炮轰谢振华”，把谢振华打下马，使山西的王谦上台，保荐极左派得势。

粉碎“四人帮”，华国锋上台，坚持两个“凡是”，大寨和陈永贵没受到应得的批判，反而红得发紫，在山西把对待大寨、陈永贵的态度确定为区分革命、反革命的标准，定为清查“四人帮”、清理“三种人”的标准，清查“四人帮”变为继续打击、专政支持过谢振华的干部和群众……本书对这方面的历史也有详尽的叙述。

本书在撰写山西曲折的历史时，力图阐明整个文革时期中央文革和地方文革的关系，地方文革是服从、服务于中央文革的权力斗争的，是上下呼应，相互利用，勾心斗角，你死我活的搏杀，文革中的执政者总是以权力为中心的，人民的利益、人民的意愿，官僚集团是不管的。真正想为人民办事的干部是站不住脚的。人民群众是被利用的工具。政治斗争是无理可讲的，讲的是权和利。正是这样的情况，使一部分善于思考的人最早觉醒，脱离开角斗的现场，去探索真理。

第六、介绍了在挫折中觉醒的青年代表

本书详细介绍了一些文革亲历者思想变化的历程，从迷信、盲从、彷徨、怀疑到觉醒。有一部分人，一次又一次站错队，一次又一次想“紧跟”却跟不上，在挫折和失败中，他们开始思考，联系到现实中的民间疾苦，社会动乱，逐渐认识到一直搞阶级斗争是错误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值得怀疑的。这些青年读书、思考、研究，最后选择了反对文革的立场。最为突出的典型，是太原的“张赵反革命集团”，是全国唯一的一个由原造反派人员组成的有组织、有纲领的反对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的组织。本书第一次全文公布了张赵集团的纲领性文件《论现状》，其中许多内容直到现在都不过时，正是国家改革的内容和追求的目标。张、赵是那一代青年觉醒的代表，说明任何欺骗都是暂时的，有限的，中国是会有人站出来反对错误领导和错误路线的。

第七、思想理论上的创新和探索

中国思想界权威期刊《领导者》61 期刊登学者周伦佐先生评论《文革中的山西》的文章中，认为该书是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立场的。他写道：“石名岗执笔写的《文革中的山西》是一部挺有分量的书稿，作者将几十年的观察与思考融于书中，成此厚积薄发之作。书名、大小标题、文字表述都颇见文采，在文革研究类著述中并不多见。作者理论功底扎实，文字干练有力，其优异的理解力和表达力，绝非那些精神本质完全异化至今仍保持文革思维和大字报水平的造反派人士所能比。山西出了个敢写文革题材的杰出报告文学作家赵瑜，本书作者和赵瑜一样出色。”本书对文革的起因，文革的直接和间接的后果，近代世界三大革命的异同，暴力革命的破坏作用，党性与派性等许多议题，都有创新性探讨。这些一家之言，可能引起争论，但也会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打开人们的思路。

不同的读者，应该还能总结出此书的其他一些特点。

长达四年多的写作，对参与者是又一次精神洗礼。虽然参加过文革，但并不一定真正认识文革。坦白地讲，本书参与者观点不同、思想认识也有差异。写作过程中有过激烈的争论，也有求同存异的妥协。经过学习和思想碰撞，对于普世价值、核心价值观，民主、自由、宪政等，作者们都学有新知，思想升华。原来官方讲“彻底否定”，使人们懒得去想文革，加上人为的限制与设障，更不愿去研究文革。其实文革学问不少，很值得研究。

本书洋洋六十万言，内容厚重，史料丰富，读者需要耐心才能卒读。本文只能简介，也有以偏概全的可能。古人讲“开卷有益”，相信本书会有这样的效果。当然，书中肯定会有错漏，希望热心读者给予指正和补充，以便再版时修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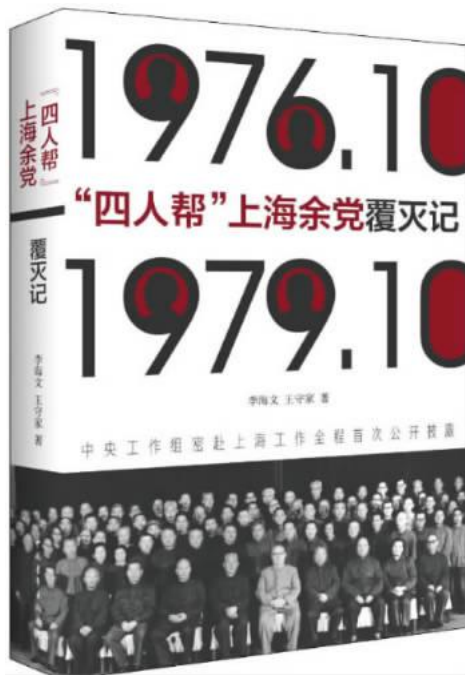
2015 年 3 月 23 日

【书海泛舟】

《“四人帮”上海余党覆灭记》前言

李海文

按：李海文、王守家著《“四人帮”上海余党覆灭记》已于2015年3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我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写了一本关于粉碎“四人帮”历史专著《转折时期的华国锋》（暂定名）。为此收集并参阅了当时的文件、档案、报纸、回忆录，采访了华国锋等七十多位当事人。华国锋说：粉碎“四人帮”后，他重点解决上海问题。他认为：只要制服“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其他都是小玩闹。因为各地的“四人帮”爪牙以上海最强，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都来自上海，他们在上海经营了10年。上海又是中国最大城市，又是中国工业、经济重地，在中国经济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而，我将中共中央的决策和中央工作组的工作情况作为一个重点，对上海“四人帮”余党覆灭历史写了8万字。之所以能写这么多，是因为得到严佑民的支持。1976年10月，严佑民参加中央工作组，1976年10月20日到上海，负责公安、清查等工作，后任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在上海工作5年。2001年7月1日他病逝上海。病重前，他将保存的资料全数交给我，要我将这段历史真实地记录下来，传之后世。同时，介绍我顺利地访问到中央工作组、公安部的诸位领导和成员，如倪志福、彭冲、林乎加、赵行志、韩哲一等。但是有两个遗憾，一是受篇幅所限，关于上海的这段历史不能展开，许多资料不能采用，只能写8万字。另外，有一个重要的史实因缺乏材料而没有写清楚。

早在1977年江小华（江华之子）告诉我，在粉碎“四人帮”之初，中央派国务院的一些同志到上海了解情况，中央掌握上海的动向。后来，在陈锦华发表的回忆文章中得到印证。2005年陈锦华在《国事忆述》一书中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后，在中央工作组到达上海之前，中共中央决定由

国务院各部委派一些人到上海去，以研究、准备 1977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名义，了解社会动向，了解“四人帮”余党有什么新动作，及时报告北京。谷牧副总理亲自同这些同志谈话。但是派出的第一批同志有多少人，具体姓名，什么时间到达上海，他们到上海收集到什么情报等情况却无从查起，只好阙如。

2008 年初在山东八路军研究会主办的学术讨论会上，我见到谷牧的长子刘念远大校，机会难得，向他请教。他说：奉党中央命令，1976 年 10 月 8 日，谷牧派秘书曹大澄等 8 同志到上海。他侃侃而谈，介绍了谷牧与王一平的关系，曹大澄如何到王一平家取得上海“四人帮”余党策动武装叛乱的情报。他强调：这些同志冒着生命危险，深入虎穴，为解决上海武装叛乱，稳定上海乃至全国局势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是有功之臣，应载入史册。

写历史要有第一手的资料。我迫不及待地问：曹大澄在哪儿？他说：1986 年曹大澄同志带了几位年青人到深圳、香港创办华艺设计顾问有限公司，定居香港，曾在香港的报刊上发表过回忆文章。什么时间、发表在什么报刊上均不清楚。真是可望而不可及。

2010 年 5 月，在山东八路军研究会的会议上，再次见到刘念远。他当场介绍杨培青大姐，说：她与曹大澄住一个楼里。会后，我从杨培青处得到曹大澄的电话。我喜出望外，急冲冲去采访，受到曹大澄热情接待。他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及他当年写的 5 万多字的《余党末日》及回忆材料，详细讲述了当时的情况。

《余党末日》登在 1977 年 5 月 13 日新华社的《内部参考》，这是《内部参考》破天荒头一次发表纪实文学。同时，编者按评价：这篇文章“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揭批“四人帮”的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和必要性的认识”。原中宣部副部长、理论界的前辈于光远在 2002 年 8 月 16 日个人网站上发表文章《我关心曹大澄的〈余党末日〉》。于老写道：

在我个人档案当中，一直保存有“本报通讯员曹大澄”写的《余党末日》。它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起，一直保存在那里。可是时间一长，就记不起是谁和为了什么原因送来的了。只是觉得其中有些史料，而且同 1975—1976 年我们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工作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运动”有些关系，所以没有处理掉。由于我对粉碎“四人帮”前后的情况比较熟悉，我敢判断，文章中所写，基本上符合我所知道的事实。至少同我所知道的事实没有不一致的地方，而且写得比较具体，我想应该找到一个地方把它发表出来。否则它就会湮没，如果那样，我就觉得很可惜。

我当即决定和他合写一篇文章。

曹大澄又介绍一起到上海的战友王守家。王守家至今保存着派遣到上海时的工作日记，共 13.5 万字。曹大澄、王守家已是耄耋之年，回想起当时的情况仍然记忆犹新，颇有几许“地下”活动的手段，惊心动魄。

花了数年的时间，终于找到谷牧派出的第一批八位同志中的两位，找到历史当事人，得到第一手资料，大大丰富了我所写的关于解决上海问题的那段历史。我内心的喜悦如同久旱逢甘雨。当即决定根据这些资料及回忆，由我执笔和曹大澄、王守家合著一本口述历史，所涉内容是从 1976 年 10 月 8 日到 1977 年 1 月底王守家离开上海时为止。着手写第一章，即他们八人到上海的活动，从 10 月 8 日到 20 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所率中央工作组到上海之前。在送曹大澄修改过程，他提出不署名。第一章主要内容 2011 年 8 月在河南党史研究室办的《党史博览》发表。

但是写完第一章后，写作难以为继。一是，曹大澄于 1976 年 11 月初离开上海回到北京，以后的情况他不了解。我费尽周折又找到当年同去上海的陈斐章。他因病失忆。二是，王守家的上海出差工作笔记多是会议记录，他在工交组工作，到众多工厂、企业调研的大量数字及专业用语，非专业人士难以看懂。如何解读枯燥的会议发言、数字成为重要的课题。三是，第一章是述事体，共 3 万多字，照此写法，目前资料难以支撑后面几章。四是，仅凭王守家的上海出差工作笔记难以反映出上海“四人帮”余党覆灭的全过程。

踌躇月旬，几经考虑，下决心写一本历史专著而不是资料汇编，从《转折时期的华国锋》一书拿出相关的 7 万字，将书中内容由 1977 年 1 月延长到 1979 年底清查工作基本结束。有了基本框架，再将王守家上海出差工作笔记中的内容及以前收集到的其他资料补充进去。苏振华的秘书丑运洲读完后，评价：当年的情节历历在目。写作因受谋篇布局之限，以补其不足，便于读者阅读、查找，增加附录《1976 年 10 月 6 日到 1977 年 5 月 1 日大事记》，将王守家的上海出差工作笔记所记载的活动尽量列出。接受曹大澄的建议，增加了尾声，对书中正反两面的人物历史全貌做一介绍，大事记相应地延长到 1984 年。全书共 30 万字。

王守家的上海出差工作笔记本很小，字迹小，难以辨认。我边录入，边写作，进展缓慢。在朋友的帮助下，请人输入电脑。第一、二稿错误百出。王守家冒着酷暑和严寒，以耄耋之年，一共校了三次。随着校样越来越清晰，写作的速度也加快了。在此基础上，我又校对一遍。

本以为自己对这段历史基本脉络已经掌握，设想用一年半载即可完成，没有想到第一稿竟写了 21 个月的时间，从 2010 年的 5 月开始到 2012 年 1 月才完成全书第一稿。其原因，首先是我对经济不熟悉，如何理解枯燥的数字颇费心思；

其次，对上海的人和事都不熟悉，一时难以理出头绪；再者，直腸癌手术后初愈，每天只能工作两个多小时。即使这样，工作周期从最初的两三个月逐渐缩短，甚至到十几天就要休息数日。看材料，熟悉情况，谋篇布局，苦思冥想，绞尽脑汁。写作的最佳状态是一气呵成，但因体力不支，常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能痛快淋漓地写出而纠结，不断加重病情，不得不停笔。直到写作快结束，身体才渐渐好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写出的产品是比较粗糙的。

2012年4月将第一稿写完后，为了听意见以便修改，停了11个月。这段时间既是等待、休整，也是让自己从材料中跳出来思索的过程。如同欣赏油画一样，不能只是近看，要站得远一些，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才能看得更清楚，找出毛病，发现问题。从材料中跳出来，冷上一段时间，再将脑中的材料重新认识、组织，如同牛的反刍一样，才会有好的消化吸收。

我认真地研究了吴晓梅等所提的意见，2013年3月开始第二稿的修改。这次一共改了4遍。

第一遍，在再次研究材料的基础上，去掉枝蔓，删去与本书主题关系不大的内容，如：王守家笔记中对各个工厂生产、运动情况的介绍。对苏振华、倪志福、彭冲、林乎加、严佑民、王一平、赵行志等人的介绍进行删节、浓缩。对所用的材料提炼、精简，重新组织。删去第一章文学色彩浓的描写，以保证全书行文的一致，基本是白描手法。同时，增加了对“四人帮”揭发批判的内容。

第二遍，因各节是按专题写的，修改大事记时，按时间顺序，将全书过一遍，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第三遍，前面的写作，也是对材料的再认识，对全局的再认识。此时，再将原始材料过一遍，原来没有看到的，现在看到了；原来看到而没有引起重视的，此时发现了其价值；原来看到而不知该放在什么地方的，现在找到了恰当的地方。

第四遍，花了半个月的时间，从头到尾再顺一遍。即使这样，仍然会有挂一漏万。欢迎批评、指正。一共删掉7万字，又增加了4万字，第二稿28万字。2014年对书稿和大事记做了认真的修改，第三稿仍然28万字。

此时，我又看到一些新的材料，又做少许改动，增加一些注释，成为第四稿。

写作是从微观到宏观，再由宏观到微观的反复过程。微观材料要细致、准确。这样保证宏观不会失去正确的方向。但是，不是说有了准确、细致的材料，就有宏观，常常是苦于拿不出来，概况不出来，既要言简意赅，又要准确，这就是功力。写作是不断认识、不断思索的过程，有了宏观把握，才能写出有内在联系、逻辑清晰、准确、生动的历史。看起来改动不大，下笔千斤重，字斟句酌。常感力不从心，有所不足。历史是需要传承的。希望后人能写出更好的作品。

粉碎“四人帮”已过去37年。在这37年中，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一，

粉碎“四人帮”，结束了十年的动乱。第二，由突出政治，政治第一，政治运动为主，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全党工作的重点，改革开放。第三，由计划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第四，执政党由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转变为各阶级的先进分子的集合体。变化之快令世人瞩目。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政治、经济局势变化很大，连语境也不一样了。现在 40 岁以下的人都不知道“文革”的复杂情况，难以想象曾发生过的种种事件，更不要说理解。有的不知道“四人帮”为何人，更不知道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为何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青人不知道“四人帮”的罪行是罄竹难书，不知道他们是恶贯满盈。有人甚至对“四人帮”的错误、罪行提出质疑；不明白为什么“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为什么要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的方法；不清楚群众为什么这么恨“四人帮”，同“四人帮”做不懈的斗争，十年来前仆后继；也不知道粉碎“四人帮”后，为什么会举国欢庆，不用动员，群众自发上街庆祝。因而，需要重新审视历史，重新研究历史，重新回顾历史，以回答人们的疑惑。

书是写给现在人看的，要让现在的人和后来者看懂。为此，需要相当篇幅介绍时代背景，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对特定历史的名词和人物加以注释。对当时的领导者苏振华、倪志福、彭冲、林乎加、严佑民、王一平、赵行志、韩哲一作了简要介绍，因篇幅所限，仅涉及与上海工作有关的内容。列举上海“四人帮”余党策动武装叛乱的罪行，这样才能看清与上海“四人帮”余党斗争之复杂、艰巨、残酷，斗争之惊心动魄，并不是像有的研究者所说“四人帮”上海余党“稀里糊涂就屈服了”¹。上海是“四人帮”发迹之地，他们在此经营了十年，将党羽安插在各个部门，企图把上海变成他们的根据地。当“四人帮”被抓捕的消息传到上海，这些“四人帮”的党羽绝不会束手就擒，一定会作乱。但是他们没有成功。一个原因，上海在历史上是一个具有革命传统的城市，上海的工人，上海的人民，觉悟是高的，上海的绝大多数干部和工人群众是好的。

更重要的是，华国锋领导的党中央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和方针。在 1976 年 10 月 6 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提出“既要解决问题，又利于大局稳定”，“要破得彻底，立得正确”。²叶剑英概括为十个字：“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

党中央指挥得当，只通知马天水、周纯麟到北京，同时派八位同志于 9 日清晨到达上海。中共中央及时掌握上海最新动态，将徐景贤、王秀珍叫到北京，做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工作。采取正确的步骤，不费一枪一弹，没有发生流血，解决了“四人帮”上海余党策划的叛乱。不失时机派出中央工作组。真是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用兵之最高境界。

能达到最高境界，与党中央的领导分不开，也与在上海的第一线领导及中央

¹ 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第 184 页，三联书店 2013 年出版。

² 严佑民回忆。《关于上海市清查工作的情况报告（1978 年，3 月 7 日修改稿）》，第 1 页。

工作组全体同志掌握政策的水平、领导能力有关。“四人帮”及其上海余党在上海经营了 10 年，他们和林彪集团在全市立案审查 305225 人，迫害非正常死亡 10407 人。事实证明 96%是错案。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率领中央工作组到上海后在短短的三年内清查、批判“四人帮”，平反冤假错案，消除派性，落实干部、知识分子政策，发展经济，工作量之大难以想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值得后人学习、借鉴。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 28 年处于秘密、地下、武装斗争中，许多重要的当事人牺牲了。新中国成立后的许多领导人一直忙于政务，没有机会写回忆录，即使写了回忆录，由于多年工作习惯，擅长做政治报告、工作报告、理论文章，所以中国共产党历史很少有生动的细节传述。久而久之形成一种传统，写党史不必写细节。写细节似乎是报告文学的任务。但是党史也是历史的一部分，这种做法脱离了中国人几千年来写历史的传统。《史记》因有大量的对话，生动的细节，鲜活的人物而打动人心，流传于世。逝者如斯夫！随着时间的推移，那段历史已离现实政治越来越远，党史回归中国历史学传统的时机已到。这本书根据回忆、采访、查证资料、实地考察，在场景、对话等细节上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尝试，希望得到同行的理解和指教。

书中的人物不少是我尊敬的领导、先辈，也有人人痛恨的历史罪人，因是历史著作，按照学术规范一律直呼其名，既没有尊称，也没有贬称。

历史著作的生命力在于言之有据，持之有故。为了便于读者检阅，凡是已公开的档案，均注明公开书籍的出处。吸收别人的采访、研究成果，都一一注明出处。以示对他们劳动的尊重。

照片由严晓藕、严晓梅、苏承业、苏承军、林新婴、林大建、许海宁、曹大澄、王守家、赵霄洛、王时驹、朱通华提供。鲁纪行、王竹、马震平扫描、整理。丑运洲审阅第一稿，曹大澄、严晓江、苏承业、苏承军、许海宁、许海星、林新婴、林大建、赵霄洛、王时驹审阅第一稿部份内容。王守家两次审阅全书。得到孙立众、朱通华、周晓瑛、冯乔帮助。一并表示感谢。

感谢责任编辑吴晓梅女士和中国青年出版社。感谢一切关心、帮助、支持过我的人，感谢为我服务过的人们。有的知道姓名，有的不知道姓名。

最后，感谢读者。真诚希望他们能对我的书提出宝贵意见。因为最终，一本书是在读者那里实现它的价值的。

2012 年 4 月 10 日第一稿于毛家湾

2013 年 7 月 31 日第二稿于茂林居

2014 年 2 月 14 日元宵节第三稿于毛家湾

2014 年 4 月第四稿于毛家湾

附——

《“四人帮”上海余党覆灭记》目录

序言

华国锋运筹帷幄决战千里之外

粉碎“四人帮”36小时后，谷牧奉令派出八人小组秘密飞往上海

“四人帮”经营上海十年之久，余党黄涛、陈阿大嘴脸

“四人帮”上海余党千方百计打探北京消息，策划武装暴乱，派人监视八人小组

不辱使命，曹大澄拿到情报；华国锋速调徐景贤、王秀珍到京

及时传出的情报让中央迅速决策，预谋中的上海叛乱胎死腹中

“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在上海传开之后

华国锋主持政治局会议解决上海问题

对解决“四人帮”问题，华国锋说：“只要把上海的问题解决了，其他各省市的问题就好解决。”

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打招呼会议，华国锋谈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

马天水脸胀通红，提出两条要求。华国锋派苏振华、倪志福做马天水工作

10月9日华国锋召徐景贤、王秀珍来京恰逢其时

徐景贤、王秀珍到北京情绪抵触，几天后都坐不住了

华国锋主持10月12日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接管上海的中央工作组人选

12日晚中央政治局再做工作，王秀珍、徐景贤终于交代策划武装叛乱问题

“四人帮”上海余党再次预谋武装叛乱，华国锋决策不战而屈人之兵

华国锋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研究解决上海问题的方针政策

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组建中央工作组经过

工农干部知识化的典型，有谋有勇的苏振华上将

1975年苏振华反对“四人帮”夺军权、夺政治局权

苏振华面见叶剑英、华国锋，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四条建议

工人领袖倪志福亲自参与了抓“四人帮”余党行动

毗邻上海，身陷复杂的政治局面中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彭冲

严佑民说：“责任由我一个人承担。”华国锋说：“我们要留你。”

余秋里推荐林乎加，谷牧推荐韩哲一、王一平、杨西光加入中央工作组
进驻上海前在人民大会堂的一次紧急会议

中央工作组进驻上海，摧毁“四人帮”在上海帮派体系

中央工作组连夜找马天水等三人谈话，接管康平路上海写作组，两个工作组合并

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与廖汉生、张挺谈话，向王一平、韩哲一了解情况

华国锋主持政治局会议听取苏振华、倪志福汇报。邓小平说：“阿丕告诉我，你们干得很好。”

曹大澄在张春桥办公室发现枪支。中央工作组进入工交组摸底

中央任命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为上海市委第一、二、三书记

以深挖发动武装叛乱的阴谋作为解决上海问题的突破口

10月30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召开中央工作组全体人员大会

苏振华微服私访了解工人民兵情况。华国锋批示：可以让民兵游行

中央工作组成员在上海的日常工作情况

第一次揭批、清算“四人帮”及上海余党反革命罪行大会

11月4日在市委领导下成立领导小组，注意使用、团结上海当地干部

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第一次作检查

小组会背对背，工交口120人中型会议，当面揭批马天水

上海区县局党员干部大会对“四人帮”、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的更深揭发

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继续补充揭发、交代

北京下发揭发批判“四人帮”的36件材料

工交组揭批“四人帮”及黄涛、陈阿大。上海生产稳步上升

对黄涛、陈阿大等人第一次面对面的揭发批判

第二次面对面揭发批判黄涛、陈阿大

依靠上海当地干部，起用韩哲一

清查“四人帮”上海帮派体系，平反冤假错案，调整领导班子

清查工作全面展开

贯彻中央23、24号文件，严佑民负责，树立三个平反冤假错案典型

1977年1月初华国锋主持政治局会议，听取上海工作汇报

70天的上海工作情况。叶剑英与华国锋的讲话

中央工作组成员陆续离沪。苏振华回海军，倪志福回北京市委

进一步揭批“四人帮”，全面复查，否定“一月革命”

1977年3月到1978年5月，上海召开全市第二次至第五次揭批“四人帮”大会

对受迫害的干部、群众开始做大规模复查

1978年12月，对“一月革命”做出否定

尾 声

苏振华英年早逝，魂归南海

倪志福连选为第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担任全国总工会主席15年

彭冲跻身于国家领导人，连任三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参与起草制定200部法律

第一个离开上海市委的林乎加先后担任天津、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一身正气可驱邪，拳拳丹心总为民”的严佑民

“一生正直护公平，两袖清风感人心”的王一平

“芝兰生于深谷，不因无人而不香”的赵行志

中央工作组其他成员后续情况

对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及30多名王洪文小兄弟绳之以法

附

大事纪（1965年11月—1983年春）

全书人名索引

参考书目

【生逢乱世】

文革中几次目睹武斗死难者

庞国义

我们这一代人虽然没有亲眼目睹抗日战争、国共内战那种炮火连天、尸横遍野的恐怖场景，可“有幸”在和平建设年代补上了这一课，那就是1967年、1968

年间那场具有“战争”规模的“全面内战”——文革大武斗。

身处那个血腥动乱年代的重庆市区平民百姓，没有见过武斗死伤者的人恐怕不多，就连我这个远离武斗，谨小慎微的“怕死鬼”，除了目睹过两位并未参加武斗而被流弹打死的中年男女邻居（见《昨天》第18期《武斗硝烟中的石桥铺场口》）外，还曾多次直面武斗死难者年青的面孔和尸骸，现在回想起来还有不寒而栗之感。

文革时期，大西南的著名高等学府重庆大学有35名各类人员非正常死亡，这个数字与全国其他单位比较起来也许平常，但特殊的是，他们当中有77%是风华正茂的在校大学生，而且是直接丧生于1967年~1968年期间的文革武斗之中（详见《昨天》第35期何蜀的《为了不应忘却的27个同学》），这种学生或学员武斗死亡人数不但高居重庆十多所地方和军队院校之首（紧随其后的是解放军通信兵工程学院17名、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11名、重庆工业学院10名……详见《昨天》第36期何蜀整理的《重庆文革武斗死难者名录》），在全国高校之中也是罕见的。要知道当时全国义务教育尚未普及，初中升高中（含中专、技校）的比例不到60%，历经十二年寒窗进入大专院校的高考平均升学率不到10%，堪称“青年精英”。然而，他们尚未展开的辉煌前程却断送于一场虚妄的“大革命”中。

武斗中我是冷眼旁观的“逍遥派”

我在文革初期参加的保守组织“赤卫军”于1966年“12·4”武斗事件后垮台，成为一名“逍遥派”，本想超凡脱俗，远离红尘，不再参加翻云覆雨令人捉摸不透的文革派别活动，便找了几本文革前出版的“禁书”，在石桥铺家中闭门偷读，“修身养性”。但武斗烽烟四起，子弹无时无刻不在头上乱飞，炮弹整日整夜地在耳边轰响，山城之大，已容不下一张平静书桌，哪里还能看书，还能“逍遥”得起来呢？想躲进“桃花源”，真正置身于运动之外是做不到的，只得依然严重关注着文革局势的发展和武斗进展状况，以便做到“哑巴吃汤圆——心中有数”。

1967年4月下旬，重庆开始出现砸宣传车、广播器材和铜管乐器的斗殴初练。5月份，不时有武斗升级为“拼钢钎”的消息传来，地点首先是在我们家不远的河运校、石油校、重庆医学院那截路段，后来发展到北碚、杨家坪、中梁山等地区。7月7日，嘉陵江南桥头的上清寺发出了小口径步枪的枪声，7月9日，北碚也传来使用小口径步枪和土制火器的消息，死人伤人的血腥大字报满街都是。各类消息报道激发了我的好奇心，我很想知道这些事情发生的原因和结果，

但我不敢直接到上述地区去，一来路程较远，二来怕遭到误伤，招致生命危险。

我审时度势，仔细分析，考虑到沙坪坝是八一五派的大本营，一派独大，除了稍远处的双碑（嘉陵厂和二钢厂所在地）之外，还没有听说在中心片区发生过什么武斗，加之我在沙坪坝一带的市一中、三中、七中、廿八中、师专附中都有同学和熟人，而且从石桥铺到沙坪坝也挺方便，就经常溜到沙坪坝去看大字报，掌握文革态势。

沙坪坝的三角碑、双巷子一带特别是沙坪公寓到文化馆之间（现为金诚广场）大字报铺天盖地，是一个仅次于解放碑的热闹信息中心。这里有全国全省最新的文革消息和全市各类打砸事件报道和时局评论，一层覆盖一层的大字报板结得如同厚厚的盔甲一般。在这里观看一番后就可顺路抵达一中校园，然后从一中围墙边缘的缺口（当时被称之为“串连门”，现在已经成为主干道沙中路的一部分）进入一墙之隔的重大校园内的男生宿舍区域，这里学生宿舍之间长长的通道上，大字报内容极其丰富，特别是《红五条》下达后的那段时间，怀着各种不同心态前来重大的人特别多，这个区域是公众“关心国家大事”的热闹场所。在这里我直接目睹了两起“敏感”事件：

一件事是1967年5月下旬某天，那个小偷何子笃（外号“何二”，已被学生抓住殴打致死）的母亲（四五十岁左右，家庭妇女模样）来寻找儿子时的情景。她是在街上看见传单后赶来校园的，心急火燎地在各幢宿舍之间跑来跑去打听儿子的下落，还一路叨念着：“我还是支持你们哟！”以表明她是八一五派的观点。最后如何找寻和善后处理怎样，我不得而知。

第二件事比前一件事晚几天，当时重大校园内弥漫着一股对中央处理重庆问题的强烈不满和抵触情绪，反到底派（当时叫“砸派”）重大“红岩公社”头头徐光明不合时宜地溜回学校，被众怒的八一五派学生发现并抓住。几个大汉把瘦小的徐光明像老鹰抓小鸡一般提到一幢宿舍的二楼边端阳台上示众，一路上还被学生们偷偷赏几下“冷锤”，受点皮肉之苦。在阳台上他一会儿被按下脑袋“低头认罪”，一会儿被揪住头发昂起脸“亮相”，还有人找来几根稻草在他头上舞来晃去。徐光明一言不发，紧闭双眼咬住牙关任人摆布，尖尖的鹰钩鼻子特别显眼，一副听天由命任人宰割的样子。楼下围观人群中有人愤怒谴责他是“六十年代的戴季陶”，是“托派”、“左左派”、“左得可爱”，有人说他偷偷溜回学校是想“捞稻草”。有许多砸派观点的外来人员站在那里默默观望，我在那里呆了几分钟，觉得徐光明飞蛾扑灯自讨苦吃，不死也得脱一层皮，生怕接下来会发生无法预测的武斗事件，就匆匆离开了。

我的一般规律是在这段学生宿舍附近浏览一阵大字报后，便从团结广场旁边那棵大黄葛树左边顺着道路从学校大门出来，经沙南街返回三角碑，沿途还可买

几张小报揣回家阅读，当然清一色都是《8·15战报》（重大八一五战斗团主办，该报连载的章回体小说“李井泉鬼魂东行记”我每期必读）、《八一八战报》（建院八一八战斗团主办）、《八一五烽火》（重师八一五战斗团主办，该报连载的“八一五史话”也是较吸引人的文章）、《抗大兵团》（三中抗大兵团主办）等八一五派群众组织编辑的小报。

在重大第一次看见武斗阵亡人员

1967年7月26日下午，我前往沙坪坝去看大字报，与往常一样到小龙坎下了电车，看见满街赫然贴着大标语：“誓向砸派讨还血债！”“向7·25事件中殉难的烈士致哀！”“唐世轩、张全兴烈士永垂不朽！”感到十分的震惊，竟是我们二中毗邻的工业学校昨天发生了动用“热兵器”的流血事件！

看了这些大标语和大字报内容，知道了死者是重庆大学的学生，他们在重庆市工业学校的“7·25”武斗事件中被小口径步枪击中头部而丧生。于是我不再按原来的一般规律从一中校园进入重大而改为从沙南街走向沙正街，随潮水般的人流一道从大门进入重大校园去探看究竟，第一次直接目睹了被枪击致死的武斗死者形象。

进重大校门往左转，不远的过道空地上用篾席搭建了一个简易灵堂（后来该灵堂转移到了图书馆大楼），两名穿军装戴红袖章的学生，左手紧握一本《毛主席语录》放在胸前，神色严肃一动不动地分别站立灵堂两侧。灵堂正面壁上挂着放大的唐世轩张全兴遗像，喇叭里反复播放着撕心裂肺的用评弹唱腔谱写的毛泽东诗词《蝶恋花·答李淑一》：“我失骄杨君失柳……泪飞顿作倾盆雨”，营造出一种悲切肃穆的气氛。狭小棚房空间里弥漫着一股浓烈的福尔马林药味，使人感到窒息难受。

一幅曾经在渣滓洞出现过的对联引人注目：

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
作千秋雄鬼死不还家

另一幅是新创作的：

碧血溅山城，喜红岩史诗又添新页
风暴扫迷雾，看文化革命谁敢阻挡

我裹在人群之中依次进入灵棚，只见昏黄的白炽灯光下，两张并排横放的灵床上各搁着一具穿着军装的尸体，用白布覆盖大半截身体，两张死者脸孔很年轻，可能是整过容，似乎睡着了一般安详。由于观看的人多，我胆子也大了起来，没有感觉那尸体多么可怕，还在尸体旁站了一会儿，想瞧一瞧头上的弹孔，但因戴着军帽且帽檐稍微下倾，无法找到那个弹着点。旁边的大字报专栏里，详细介绍了两位死者的生平事迹，我也同许多人一样，围观阅读了大字报上面抄写的死者日记片断。

过道四周摆满了各群众组织送的花圈，分别写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挥泪继承烈士志，誓将遗愿化宏图”等挽联。

前来悼念的人群络绎不绝，估计当天有近万人次前往，有的是本校教职员工，有的是周边单位组织的群众，排着队，抬着花圈，还有的是自发的、随大流的、看热闹的人群，因为这是重大乃至沙坪坝地区第一次因武斗死人的祭奠场面。

当年重庆大学专业武斗队伍叫“301”野战部队，第一位武斗死者张全兴就是该部队成员，采矿系三年级学生，家庭出身小商；另一名死者唐世轩是一名摄影爱好者（后来被传为“战地记者”），机械系三年级学生，出身工人家庭，独子。

我看见四周遍布的粗壮黑体大标语，和那些张贴在专栏上的哀悼文章，不由情绪受感染，立刻掏出随身携带的小本本，抄录了大字报专栏中的几首小诗，其中一首偶然保留了下来，是纪念唐世轩的，题目是《他不止二十二岁》：

他睡了，
穿着草绿色的军装，
戴着红卫兵袖章，
安详而骄傲地睡了……
不！你没有死！
校园里贴着你火辣的大字报，
大田湾留着与你与保皇军搏斗的场景。
在北京你仰望着人间的太阳，
长征路上有你光辉的记录。
在北碚你抢救过危亡的战友，
施家梁你摄下匪徒行凶的镜头。
……
廿二岁，多年轻的生命，

不，你不止廿二岁，
人生的价值岂能用逝波计算？
你理想的生命犹如千年古松、万年群山，
永远流芳百世、浩气长存！

记得文革前的六十年代初，为了粉碎蒋介石反攻大陆的行动，实行“全民皆兵”，在学校盛行一项国防体育运动——小口径步枪射击运动，我读初中时的石桥铺初级中学（现为“渝高级中学”）就有十来支枪（其中5支打不响的用做练习瞄准用），上体育课时全校学生都曾经分别打过限定的5发子弹。我打篮球投篮很准，但天生不是玩枪的料，所打的5发子弹有4发脱靶，仅一发打在靶上挂角，还不如女同学，是班上射击成绩最差的一位。

而学校射击队的十多名队员，则是每周星期四下午第二节课后，就在学校旁边的堰塘大坝中部靠后一点立起木靶子，招呼那头坡上劳作的农民避到另一个山堡后面去，然后趴在大坝的这边地上，端枪瞄准50米开外的目标“乒乒乓乓”地放枪。射击队队员们过足了枪瘾，至少每人打完30发子弹后，训练才告结束。

后来在重庆二中上高中时，听说该校有学生被选为沙坪坝区代表队参加过市里举行的运动会射击比赛，还取得过较好名次（二中距重庆射击俱乐部不远，八十年代后，更有学生何跃明、蔡智勇代表国家队多次打破亚洲和世界纪录）。而作为中等专业学校或技工校的工业校、石油校、五一校等同样位于射击运动俱乐部附近的学校开展射击运动比普通中学更加普遍，他们每周都直接到射击俱乐部的靶场训练，成绩也比较突出。武斗刚萌发阶段，该射击俱乐部的枪支几乎全部流散到了附近学校，成为当时的武斗利器。

“7·25”事件之后，重庆两派正式展开了大规模真枪实弹的热兵器战争，我从此不敢再去重大校园内“关心国家大事”了。

想用马刀换枪的中学生一去不回

1967年的“八月战争”中，武斗战火在我们周边猛烈地燃烧，我住家的石桥铺场口虽属武斗边缘地带，却常看到荷枪实弹的武斗兵车和坦克经过，不远处大坪、杨家坪不断传来隆隆炮声，有时彻夜不停。议论武斗战况交流伤亡信息成为场口居民的主要话题，有年长者回忆说，1949年共产党军队攻占重庆市区时的南泉战役远没有这样大的阵仗。

1967年的“九五”命令下达后，武斗暂时停息，外出避难返家的街坊群众议论最多的是8月份潘家坪、杨家坪死了好多人，怎么惨重，说得活灵活现、天

花乱坠。一天，我父亲从单位（石桥铺综合商店）下班回来，说同事“余老坎”17岁的孙子余官志（文革中改名余承志，八一五派石桥铺民中育新纵队成员）已确认在8月18日的潘家坪武斗中阵亡，家里人已去收了尸。余老坎在单位对着同事们谈到孙子离开他们时的情况，捶胸顿足地哀叹：“我喊他（指孙子余官志）不要去（指搞武斗），实在躲不脱就‘梭边边’（躲缩在后面的意思），结果他想用马刀换步枪，还要冲在前头，哪个不遭嘛！”

余老坎家住石桥铺街尾的醪糟铺，年龄接近七十（当时集体所有制的合作商店尚无“退休”一说，故仍系在岗职工），满头白发，蓄着一副杨白劳式的山羊胡子，曾因第一个到大田湾体育场观看造反群众集会游行而遭到过单位领导点名批评。他的另一个孙子是重庆工业校反到底“红岩兵团”成员，因为是住读，无法管束和了解他是否参加了武斗。而留在身边的这个孙子余官志平时被约束得很严，一般不准他到校参加活动。

若干年后，我在沙坪公园墓地遇见前来扫墓的余官志的妹妹（当时她读小学），据她介绍，1967年8月17日下午，他们一家正在给旧房添瓦，一个同学前来找余官志，把他拉在一边，悄悄地嘀咕了一通，余就随那个同学一道走了，家里人阻止都来不及，谁知第二天就阴阳两隔步入黄泉。那次潘家坪大战，八一五派有一百多人阵亡。

家人去收尸时，余官志的尸体躺在距离反到底派武装把守的房屋不到10米远的水池边，旁边丢有一把马刀，尸体已经腐烂，是由他父亲和同学根据他身背的书包和穿的衣裤仔细分辨出来的。

我闯入了尸骨丛中

石桥铺场口那棵高大的洋槐树下，是我们场口十来个邻居男孩每天傍晚饭后必聚的场所（武斗剧烈时到乡下“逃难避祸”除外），我是这群男孩之中唯一的高中学生，年龄最大，成为当然的“娃儿头”。每天所议内容就是交换本街道本地区的见闻，不时也有个别大人加入进来说两句就匆匆离去，有熟识的燎原中学（石桥铺中学）或育新中学（石桥铺民办中学）的武斗学生回家路过也面带微笑打一声招呼相互问候，我极希望他们能透露一点武斗信息，却总是一无所获。

隔壁邻居有位十一二岁姓周的“矮哥”，圆脸、大眼睛、大脑袋，剃个光头，我们有时叫他“小鲁智深”，他机灵得很，是我们这个“自然信息群”最活跃的积极分子。他父亲本来在街道运输队当抬工，在1966年“红八月”，单位开始清理批斗“牛鬼蛇神”时，顶不住巨大的精神压力，某晚悄悄窜到附近电车保养厂（即电车总站，现渝景·新天地车场）的车间横梁上上吊自杀了。“矮哥”家中

一贫如洗，夏季从来没见过他穿过上衣，下穿半截“招招裤”（用绳子捆腰的短裤），挺着一个“死肚山”（大肚皮），有事无事整天在大街小巷和附近生产队的山坡田坎乱窜，是一名刺探各类情报的“包打听”：哪里有武斗的蛛丝马迹，哪里有新鲜大字报贴出来，马路上又过了多少辆武斗车和坦克，当然还有副食店、肉店、菜店公布的当月号票是多少号码，定量多少，他都能在第一时间内得知，并迅速向我们传达。

1967年9月下旬，隔壁“矮哥”去了一趟杨家坪（他舅舅在杨家坪空压厂工作），回来后向我们报告说杨家坪街上武斗中被打烂并烧毁了许多房子，建设厂的清水池还有很多尸体躺在那里，好多人都去看过了，他也去看过了，这一下触动了我想去现场看一看的那股神经。

从石桥铺到潘家坪和杨家坪的路程都差不多，大约七八里，但潘家坪是高干招待所，文革前路过那里大门（当时是侧门）时发现有人站岗，挺神秘的，不允许外人进去。而杨家坪则不同，六十年代初，我在石桥铺中学读初中时，学校每次组织看电影，就是步行到杨家坪街上的建设电影院；我们一伙球迷看球赛，也是步行到杨家坪体育场；逢年过节搞活动，还是步行到杨家坪的重庆动物园（又叫“西区公园”），相比之下，杨家坪在我心目中占的分量更重，是我的主要牵挂。杨家坪被烧毁成什么样子？武斗战场是什么模样？我好歹是这个信息群的“一号娃儿头”，如果不亲临现场目睹，那不就显得太孤陋寡闻，连小学生“矮哥”都不如了吗？反正武斗已经熄火，别人去得，我为何去不得？以后战场打扫清理干净了就没有机会了，我决心壮起胆子先去一趟杨家坪清水池瞧瞧。

1967年10月，到处都在传达学习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时的重要讲话，说七、八、九月的全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而且越来越好。10月1日，重庆市革筹冒雨组织举行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8周年的十万群众游行，欢呼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国庆节第二天午后，我抓紧时间独自一人沿石杨公路去了杨家坪（我担心两三个年轻人一路行走容易被怀疑是派性组织人员）。那天天气阴沉，厚重的云块在空中堆积，随时可能向下垂落。经过一个暑热的夏天，气候开始转凉了。沿途是一派大战后的寥落沉寂景象，陈家坪、石坪桥路旁那些厂房没有机器轰鸣声，家属宿舍门口没有嬉笑的人群，原先繁忙的公路上冷冷清清，没有任何汽车过往。道旁高大的法国梧桐树叶在秋风中摇晃，开始褪去夏季那般深绿，偶尔遇见一个路人，也是目不斜视神色严峻地匆匆行走。

到了新华印刷厂大门，我按照“矮哥”给我指定的路线，从公路左面没有人守卫的工业学院大门直接走了进去。该校在“八月战争”中遭到重创，教职员全部撤离，空旷的校园里没有发现有人迹活动，那排1953年修建的别具一格的琉璃瓦教学楼也因战火熏燎显得灰头垢面，一栋职工宿舍被烧成光架架犹如时光

倒流，使人联想起抗战时期日本飞机大轰炸后留下的残垣断壁。四周静寂得可怕，我鼓足勇气径直穿过校园抵达后门，从一段围墙缺口迈出去，面前是一片不见一个人影的荒凉坡地。

清水池是国营重庆建设机床厂为解决职工生活用水的蓄水池，位于该厂单身职工宿舍西面劳动村的一个高坡上，北边与重庆二十中遥望，南面与重庆工业学院接壤。占据了 this 制高点，就等于控制了谢家湾正街公路对面的建设厂大门。



八一五派若控制了 this 制高点，还可以解除反到底派对工业学院的威胁，所以他们以该校为据点，不顾一切地要拿下这个由反到底派占据的清水池高地，于是在8月上旬，这里爆发了一场动用现代化兵器的激烈争夺战，双方死伤惨重，留下了与8月中旬展开的潘家坪战斗一样触目惊心的悲壮场景。

（上图：文革后修复的清水池围墙已经拆除，再难寻找当年恶战痕迹。）

我小心翼翼地埋着头攀登田坎，试图一步步朝山堡顶端的那段围墙——清水池走去，以便居高临下，俯视整个周围环境。但仅仅走了三四十米，就突然驻足不前，因为面前出现了一具尸体。

我定睛一瞧，这具穿一身劳保工装的尸体双臂向前俯卧在地里，衣服与暗褐色的泥土混裹在一起，已经分辨不出本来的颜色。从身量体型看此人最多只有十七八岁，他头部盖着钢盔，腰间束有皮带，斜挂一个也许是用来装“红宝书”的军用挎包，不远处有一把锈迹斑斑的似刀似剑的铁器。

再仔细一看，不由倒抽一口冷气，原来那个钢盔遮掩下的后颈窝只有一根颈椎与劳保服连接，裤腿空洞洞的，露出一根木柴棍一般的枯骨插在解放鞋空空的鞋窝里，一群群绿头苍蝇在周围飞舞，一堆堆白花花的蛆虫在旁边乱翻——妈呀，原来竟是一具骷髅！

我眼睛一黑，后退两步，随风飘来的恶臭使我差点作呕，因惊讶而张开的嘴巴久久不能合上，瞬间定格的画面顽固地停留在大脑深处几十年不能消除。

我惊恐地抬头朝四周一扫，目力所及之处，原来曾经种过蔬菜庄稼的坡地早已荒芜，杂草丛生，几簇低矮的灌木在风中抖索，在前面的田坎下，坡土里，静静地趴着躺着七八具尸体残骸，有穿劳保服的有穿军服的，有戴钢盔的有戴军帽的，身边都没有枪支（估计早被人捡走了），包括我已经走过的路段左右较远的

地方都有尸骸存在，只不过刚才只顾埋头爬坡没有注意观察到，实际上我已经闯入了尸骸的包围之中！

我顿时感觉陷入了群鬼乱舞的幽冥世界，一股冷森森的恐怖感猛袭过来，浑身起了鸡皮疙瘩。

我实在无法接受的现实是：一个多月前，他们还是活生生、英姿勃勃、豪情满怀的红卫兵小将或青年工人，高举着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旗帜，头上罩着崇高理想的光环，呐喊着狂热口号，迎着枪林弹雨无畏地冲锋，那是多么英勇悲壮的一幕啊！可惜子弹不认人，无情的钢铁弹丸瞬间夺去了他们的生命，血肉之躯变成荒尸野骨，摆在那里无人理睬自然腐烂……

我既不敢小心翼翼地接近那些无人收殓的尸骸，更不敢继续向上走，去数一数整个坡面到底残留有多少具尸体，脑子里却忽然蹦出“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字眼。古人哀叹“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些躺在清水池下的尸骨，即使有的不是“春闺梦里人”，起码应该是父母的掌上宝心头肉，他们的家人此时正日思夜想，急切地盼望着他们归家团聚，是多么的焦虑，多么的失望，多么的无助呀！

秋风拂面，我不禁打了个寒颤，脑子混沌不堪。我后悔事先没有详细询问“矮哥”怎样才能观看清水池战场的情况，完全以为是站在高处朝下远远瞭望，哪里知道半道上就被尸体拦住去路，估计越往上走，尸骸就会越多。完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如今孤身一人，陷入了这凄凉恐怖的是非之地。

我心虚得直冒冷汗，岂敢在此久留？乘离天黑的时间还早，周围也没有出现有危及生命安全的可疑迹象，便顾不上圆满实现事前脑子里所设想的“考察计划”，立马撤退。至今我还清楚记得我紧张害怕得两只脚软绵绵的无法把持，一步一晃几次差点被坡坎绊倒，连跑带跳慌不择路逃离现场的情景。

直到走上正式公路，还心存余悸，胆怯得没有心思和信心到近在咫尺的杨家坪大街上去看被战火焚毁的弯弯大楼、百货公司、食品公司、电影院和瓦舍民居的残垣断壁，急急忙忙顺原路打道回府了。

为此，多年来我一直在搜寻清水池大战的有关资料，知道了当时双方交战的武器除了步枪、冲锋枪外，还有 12.7、14.5 高射机枪，三七高炮和坦克等，可以想见战斗之惨烈。由于当时临战仓促，缺乏统一指挥，双方参战单位众多，人员组成复杂，有的武斗人员之间互不认识（估计其中包括有郊县农民和文革前下乡的老知青），加之阵地几经易手，在连续三天的反复争夺战中，不断有尸体转移送走，也有人因伤重被抬下不治身亡，仅靠战场遗留下的尸骸来推算死亡人数难度很大。

在重庆市政协学习与文史委员会编印的《口述重庆文革》中，曾任八一五派

八一兵团建设厂 6657 团“狂飙”队负责人的苑隆伟对清水池战役之后有过这样一段叙述：

“他们（指参加过清水池武斗的人员）统计，两派在一次武斗中打死的学生有 132 人，这个数字是比较准确的。1967 年‘九五命令’下达，我们回厂到清水池去看过一次，想去看胆子又小，于是约了一些人去看现场，死了好多人，池子里有尸首和白骨，看到不少的死者脚骨上还套着解放鞋，尸首肋骨毕现的腰间套着皮带，池子里恶臭弥漫，我们憋着气捂着鼻，赶快离开。那情景真是人间地狱，恐怖得很！只有这清水池和潘家坪是重庆武斗死伤最多的。”

另一位口述者，八一兵团建设厂 6657 团负责人姚永年则说：“清水池那一仗两派一共（被）打死了 94 人”，“后头统计了的，包括学生、工人、农民”，“是两派头头坐拢来统计的”。如果真是这样，我认为这个数据是比较接近实际情况的。

“小天棒”被夜袭队点名射杀

经过文革近两年的反复折腾，1968 年的山城重庆，整个社会处于严重的无政府状态，局面极其混乱。“无产阶级司令部”的“3·15”与“4·27”指示相继下达，中央首长们对重庆问题的表态是两派各打五十大板，形成“你有 3·15，我有 4·27”的政治态势，四川省革筹（后为省革委）和重庆市革筹（后为市革委）始终无法控制武斗局面，甚至都有暗中支持一派武斗之嫌。八一五派一改 1967 年下半年的弱势，抢先控制了生产武器的兵工厂，在武斗中迅速占据上风，反到底派失去了上一年的武器优势，只得一打起来就跑，十万余众撤到成都和四川各专县，投靠当地与本派观点相同的临时权力机构或群众组织去吃“支左饭”。除少数地方还有激战外，重庆市内大部分地区出现了少有的短暂平静。

由于武斗交战双方均感到要打垮对方，独享“左派”桂冠和文革成果的希望落空，厌战情绪上升，“继续革命”的动力大为衰退，派性观点有所减弱。暂时获胜的一方也没有什么喜悦激情和成就感，反而整天牢骚满腹，怪话连篇，许多人公开对江青、康生等中央文革要员进行责骂。没有了崇高理想和外界压力，一些中学生百无聊赖，躁动不安，出现了不分派性，只管拉“兄弟伙”、“操社会”的风气，于是就发生了一些并非派性冲突的武斗流血事件来，燎原中学（石桥铺中学）的朱清云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丢了命。

我清楚记得 1968 年的 8 月那个貌似平静的日子，我家附近的石杨路上，常会看到这样的场面：

一辆载着数名武斗学生的嘎斯车在场口边的公路上疾驰，一路上喇叭狂鸣、

灰尘漫卷。一个吊着驾驶室车门、站在脚踏板上的瘦小个子中学生，舞动手中钢鞭，一边狂叫一边朝路旁衣衫单薄的行人挥去，一名被鞭子击中的行人触电似地跳了起来，“哎哟”大叫一声，肩膀上马上现出一道粗红的血痕……

这个扬鞭打人取乐的浑小子就是燎原中学初一学生朱眼镜，只有十五岁，先参加的是反到底派，在一次武斗中被八一五派俘获后“反戈”投靠了八一五派，他本来就没有什么信仰追求，参加哪一派都无所谓，关键是能有枪在手，以改变他受压的境遇。

他个头不高，身体发育单薄病态，戴一副近视眼镜，手无缚鸡之力，文革前他在学校和社会上经常被人欺负，生活在压抑郁闷之中，性格变得十分内向，本是个值得同情的对象。文革武斗爆发后他终于有了发泄机会，在血腥环境熏染下扭曲了心态，向周围人群采取种种报复行为并从中得到心理满足，成为人见人恨的“小天棒”。

我就直接领教过他的淫威。一天中午我奉母命到石桥铺中学通知我弟弟（石桥铺中学初三学生，白天返校搞所谓的“复课闹革命”，中午可以在学校就餐）回家，正遇朱眼镜手持一把半自动步枪守候在教室大楼前的石梯上，身上不太合体的工作服一荡一晃的敞开着，露出一根根明显可见的肋巴骨，从喉咙里挤出个沙哑声音问道：“哪里的？”我刚对着教室喊了一声弟弟的名字，还未来得及回答他的问话，他就用刺刀朝我逼来（这是武斗人员盘查行人的一贯招式，我1967年10月5日返校领粮票时，在五一技校旁边路上也遇到过类似情况）。我弟弟闻声出来厉声喝住了他说：“这是我哥哥！”这家伙表情演变如同川剧“变脸”那般迅速，忽然“叭”的一个立正，皮笑肉不笑地朝我行了一个军礼，“豁飘”（瘦骨嶙峋）似的身体再一鞠躬，吐词不清的沙哑声音仿佛是说：“原谅小弟冒犯，大哥！”

不伦不类、油头滑脑的拙劣表演令我哭笑不得，拿这类小天棒有什么办法呢？只好懒得理他，不屑于与他搭话。

我刚与弟弟摆谈了几句话，忽地耳边“砰”地一声枪响，原来朱眼镜用半自动步枪瞄准不远处树上一只麻雀放了一枪，麻雀惊走了，树叶纷纷下落，把我更是惊了一跳。只听到朱眼镜嘴里嘀咕了一句“老子的眼眼还不神”（即瞄准功夫不到家）后就提着枪若无其事地朝一边走去了。我真不敢在这里继续待下去，拉起弟弟急忙回去了，心中总是担心那家伙会不会在背后朝人射击？

这个小眼镜恶名远扬，附近居民常用一句“朱眼镜来了”的恐吓话，使正在啼哭的小孩停止嚎啕。在无可奈何之际，都希望这个变态的小魔鬼早日挨枪子儿，赌咒他：“龟儿子不得好死！”

这个赌咒不久就兑现了。某天，朱眼镜在石坪桥街上“操社会”时，对本派

七一中学（石坪桥中学）武斗队的头头出言不逊，结下怨仇。七一中学那个头头咽不下这口气，想报复却势单力薄，便找到附近重庆钢铁学校八一五战斗团的“兄弟伙”帮忙，钢校八一五的头头也只认兄弟伙不认派别，一口应允要给他“扎起”（“帮忙”之意），便于1968年8月17日，天刚蒙蒙亮，联合武装偷袭了燎原中学。该校教室的留宿人员完全没有防备，连底楼用条石筑成的小通道也没有岗哨，使偷袭者顺利进入二楼门窗大开的第一间教室。偷袭者大喊一声：“朱眼镜！”睡梦中惊醒的朱眼镜迷迷糊糊地抬起身来问：“哪个喊老子？”见势不对，尚未来得及伸手拿枪，就被一梭冲锋枪子弹击中头部斜倒在床沿。

朱眼镜的死讯当天上午就传遍石桥铺、陈家坪、石坪桥一带的大街小巷和厂矿企业，居民们闻讯无不拍手称快，我在屋门口就听到街道修缮队木工李师傅在街上喜形于色地大声说：“狗日的朱眼镜终于遭打死了！”一些居民群众还聚在一堆绘声绘色地摆谈着听来的经过细节。说当天是朱眼镜16岁的生日，武斗队的兄弟伙们头天晚上为他办生，海吃海喝，搞得酩酊大醉，是个饱死鬼。为此我专门向兄弟求证，他回答说：“哪有这么遇缘（碰巧）哟？完全是添油加醋、道听途说。不过那天是个星期六，夜袭队选择这个日子的凌晨准确出击，显然是经过一番周密调查和策划的。”

有一个细节是真实的，就是枪响之后，住在隔壁一间教室的一个外号叫“冬瓜”（姓吴，已病逝多年）的队员突然惊醒，果断飞身跳上窗台，伸手抓住外墙上的避雷针线，居然从二楼顺势滑下地面，仅脚被轻微扭伤，避免了被俘的命运。他一拐一拐地逃向附近的省初级党校，向驻扎在那里的解放军报信求援，及时解救了被俘后押解到钢校的伙伴们免受更多的折磨，事后被同伴们奉为了不起的“逃命英雄”。

我不但憎恨武斗而且厌恶无休无止聒噪的派性文斗，对文革中发生的大小武斗事件奉行“可听、可看、可记”和“不说、不传、不表态”的“三可三不”原则，以表示我“逍遥派”的中间立场。但我对清水池的死难者们尚存有一丝怜悯同情之心，他们毕竟是为了那个所谓的理想信念在战场上真刀真枪的厮杀而战死“沙场”。而耀武扬威，把刺刀和钢鞭指向手无寸铁无辜百姓的朱眼镜死于非命，我内心的反应却十分复杂，一方面觉得他作恶多端、劣迹斑斑，应该受到严惩，另一方面又觉得他年纪太小，罪不当诛，这样的惩处方式太残酷。据说“一打三反”运动中清理武斗案件时，附近居民群众曾经联名写信要求工宣队对打死朱眼镜的凶手法外开恩，从轻发落，此事不知是真是假？

参加了一次沙坪公园墓地的葬礼

天气太热，朱眼镜的尸体被搁放到石油转运库的冷库保存了两天。第三天，便被同伴们裹上白布塞进赶制出来的薄木棺材中，抬上那辆他经常吊车门兜风逞威的嘎斯卡车，一路朝天放着枪运送到沙坪公园八一五派的公墓。

说来也巧，那天我正好站在场口公路边，开车的唐某（外号“堂客”）和车厢上站立的石桥铺中学学生大多是同一条街上的崽儿，便停下来招呼我一道去沙坪公园。我起初不肯，那个站在朱眼镜过去经常站立的位置，左手吊住车门，右手挥舞一支驳壳枪的廖承平（外号“尿包”，已于十年前病逝）跳下车来，非常热情地连拉带拖地要我上车，我太担心拉扯中驳壳枪走火发生意外，便不得已爬上了车厢，身后就是盛着朱眼镜的薄木棺材，有一股刺鼻的怪味道，我捂着鼻子强忍着，尽量不去想它。

这是我第一次到沙坪公园墓地。当时处于荒郊的沙坪公园后门周围是一片片农田，只有一条狭窄的机耕道可抵达墓地附近，里面热闹非凡，人声鼎沸，砖头遍地，到处在打石头、和水泥，建墓立碑，有许多已经成型。

我们下车后刚一进去，就看见石桥铺街道运输队的几名“牛鬼蛇神”迎了上来——他们是学生们日常管制调教的对象，被指派提前一小时前来这里挖坑的。我认识的那个外号叫“黄狗”的莽大汉（民国时期当过一任保长），指着一个用锄头挖好了的大坑说：“就在这里”。他们上前合力把棺材从车上抬下置于坑中，家属中有人说了句：“把棺材揭开，最后看一眼。”于是，大家就纷纷挤过去看。我也探头一瞧，只见朱眼镜穿着军装躺在狭小的棺材里，上身覆盖了一层白布，头部裹满了白色纱布，只露出半边脸面，没有了眼镜，眼睛微闭，嘴稍稍张开，似乎想呼叫什么，却没有喊出声来。

这是我在文革武斗期间亲眼目睹的最后一张武斗死者面孔。那一时刻，我忽然怜悯起尚未成年就命丧黄泉的朱眼镜来，心中不停地祷告，希望这样的悲剧不要再继续上演了。

随后在棺材上面垒成土包，十多名武斗人员一齐举起手中的半自动步枪朝天“乒乒乓乓”打完一匣子弹，一百多颗弹壳如下冰雹般顷刻坠落在坟包四周。突然爆响的枪声震耳欲聋，吓得墓园内建墓的工匠们扔下手中的工具，捂耳抱头地



避让。事后一名姓徐的学生（他被钢校学生俘获时曾挨了几枪托）说，鸣枪时旁边一人的脚被地上的土块梗了一下，枪口一歪，子弹朝他耳边擦过，害得他也差点见了阎王。

1968年10月，石桥铺中学和石桥铺民中把武斗期间阵亡的5名死者合葬

在一起（当时区革委已经有了两校合并的意向，没想到武斗死者合墓成为两校合并的第一项实际行动），修建了沙坪公园墓群中唯一的一个中式形状墓顶（见上图），墓碑上刻着死者的姓名，他们是：朱清云、彭光裕、朱志林、廖世凯、余承志。

【研余杂记】

永远的遗憾

周孜仁

无庸讳言，在文革史料的抢救、搜集、整理和回忆录的撰写方面，云南地区相对滞后。就笔者掌握的情况，至2014年秋，由云南文革当事人书写并出版（含自费出版）的回忆录，仅有寥寥3、4部，如当年炮派领袖方向东的《方向东传奇》、昆明工学院“八二三”派领袖石峰的《奇梦缘》等，文本之份量与价值，亦很难算得真正意义上的文革史录。诚如是，2014年秋，笔者读到文革中云南“八二三”派二号领袖刘殷农先生自费出版的回忆录《一个幸存者的自白》，欣欣之情，甚难意表。笔者很快推荐给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民间历史》网站负责人熊景明女士，同时推荐给文革研究网刊《昨天》主编何蜀先生。何先生很快在《昨天》上予以摘选发表，以期此举对云南及与云南情况相似地区的文革研究能有一些推动与启迪。

经阅读过这部回忆录的朋友交流，共同认为，刘殷农这部文本叙事清晰，条理分明，文字精当。尤其作者作为公安干部，当初如何受命盯梢造反派，而后终于为时代精神所感召而断然反戈，成为了“八二三”派的领袖人物，此后有关阎红彦之死前后的冲军区、游斗赵健民、陪中央派来的法医勘察现场等等亲历，都写得十分生动；文革后被监禁，服刑贵州17年，漫漫狱中生涯，记叙亦很是感人。在原“八二三”派一号领袖黄兆其和主要“笔杆子”涂晓雷等均已辞世且未留下回忆文字的情况下，刘殷农的回忆就更显得难能可贵。阅读者的共同遗憾，则是作者对文革群众运动最为重要的1967和1968两年，甚少著字，许多地方都一笔带过，给这部本该十分成功的文本留下许多疏漏和重大不足。

2014年底，我因事赴渝，得以与何蜀先生就刘殷农回忆录进行了面议。何先生特意要我向刘殷农代为转赠重庆原八一五派“文攻武卫总司令”阳增泰先生的回忆录《写给历史的交代》及《真相与反思——2013年〈昨天〉精选》供刘参考。返昆后我即向刘殷农转告了何先生关于其回忆录的修改意见，并请他在阅读赠书后，与我再行商量文稿如何着手修改完善。

文革期间多个年份，我曾供职于云南省委办公厅，与当时云南两大派群众组织的头目多有接触，刘殷农亦为其中之一。当时他已身任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昆明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昆明市委常委等要职。做事实在，不尚张扬，是他留给我的基本印象。文革结束后，他被以“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等罪名获刑 17 年。刑满出狱后在昆明景星街花鸟市场开一间小小的店铺“太公渔具店”，大约当年朋友同情其遭遇，多有照顾，生意一时甚火。笔者亦前去捧场，他递来一张名片，上面赫然就一个职务，不是“原什么什么刘某某”，而是简简单单四字“太公经理”。大约他不想让人们怀想当年赫赫有名的“刘殷农”的不堪旧事。渔具买卖正火，听说他却倏然转身，到翠湖公园去开了茶馆。笔者还来不及前去寻访，却闻茶烟已渺，刘君早不知踪影。直到 2014 年秋，他来到我所在的云南老年网络大学，送来了他洋洋十数万言的回忆文稿，令人快活如之。

己未年关在即，我正计划利用春节长假与之详商回忆录修改事，偏偏大年夜，除旧鞭炮待响，手机陡然传来噩耗：是日下午四时，刘殷农先生突发脑溢血，不幸辞世。

我不禁怆然：又一段历史被永远带走了！

正月十一（3 月 1 日）是刘殷农先生遗体告别日。哀乐中满厅悼亡人，当年与刘殷农喧嚣街头、奔走边野、同生共死的热血青年，如今个个皓首苍颜，垂垂老矣。

历史留给那一代文革亲历者的时间已经不多。笔者于是想起，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其时这些亲历者们还正当年华，还是能够做一些事情的，包括把自己人生中最重要、亦最该书写的故事记录下来，为中国历史最终无法绕过的“文化大革命”，留下第一手证词。其时，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在为生活奔忙，笔者多有鼓动而总遇推诿，亦实感无奈又很可理解。如今岁月已老，来日不多，离开悼念厅，看满目白发，我只能在心中祈祷了：

愿这些朋友们对不多的来日倍加珍惜，除了过好安详晚年，亦祈盼他们能为了自己、国家和时代的过去，为我们的孩子，为千秋万代永无止境的历史，留下一点值得留下的文字来。

【友情链接】

《当代中国研究》特刊征稿

文革 50 周年：回顾与展望

特邀编辑

董国强（南京大学）、王元（东北文化学园大学）

截稿日期：2015年12月31日

近 50 年前的 1966 年，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整个中国都卷入其中，造成了人民生命财产和民族文化遗产等方面的巨大损失，国家政治发展的倒退，社会道德伦理的沦丧。如果说文革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国家错误，一定会得到不少人的赞同。文革的恶劣影响根深蒂固，至今我们还可以看到文革式的思维、政策、以及治理方式。不过从学术研究角度看，十年文革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研究课题和研究素材。尽管多年来由于一些人为的限制因素，许多学者视文革研究为畏途，许多重要课题和大量历史资料尚未得到有深度的研究，但依然有人在此领域默默耕耘，不断推动文革研究向前发展。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加入这个行列。

50 年来，中国大地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也获得了空前的解放。而且随着时间的积淀和各种史料的不断涌现，现在回头看十年文革，应该比以前看得更清楚、更全面，对它的评价也应该更客观、更公允。有鉴于此，《当代中国研究》筹划在文革 50 周年的 2016 年出版一期关于文革的专辑。我们特别欢迎有深度的个案研究，有广度的综合分析，以及有理论建树的文章。题目和题材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 (1) 文革概念的理解及其阶段划分研究
- (2) 对文革复杂动因的深入研究
- (3) 文革期间政治动员和舆论宣传模式研究
- (4) 文革期间群众运动特点研究
- (5) 文革期间大众社会心理研究
- (6) 文革期间重大事件个案研究
- (7) 文革时期不同类型代表人物研究
- (8) 文革时期日常社会生活研究
- (9) 文革运动国际影响研究
- (10) 中国文革与其他共产国家政治运动的比较研究

我们欢迎中文或英文写成的论文。论文一般不应超过8000字（包括注解在内）。作者应参照《当代中国研究》的网站（www.modernchinastudies.org）有关论文格式的指示。请把论文电邮给

董国强: dongguoqiang_1962@126.com, 或

王 元: ywang@pm.tbgu.ac.jp